

在南斯拉夫的監獄 和集中營里

索福克里·辽茲利
雅維爾·馬里奧 著

(內部發行)

00016

目 录

代序言	1
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特殊机关	4
监狱、流放和杀害是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方法	5
八千多名门的内哥罗共产党员被关进集中营	8
铁托是怎样消灭在苏联生活过的共产党员的	10
军队里恐怖的清洗和消灭党员军官及爱国主义者	17
五千名关在狱中的军官	20
下列军官被判处死刑	24
在铁托私人卫队中的逮捕	25
一万二千名军官退居预备役	26
哥里·奥托克——恐怖和死亡!	27
奸细活动——铁托集团的主要工具	29
通往地狱的道路	31
请看臭名远扬的“排队”	32
修正主义者给纳粹分子的刑罚加添了什么新东西	36
犯人分成三类:积极分子、消极分子和匪徒	38
折磨“匪徒”的刑讯	39
犯人不穿衣服,饿着肚子在雪天和雨天工作	40
还要受许许多多刑罚	43
对那些不愿当变节分子的犯人实行抵制	44
犯人在判刑后被关进集中营,但他的案子到此并没有 结束	45
审问人员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培养特务	47

納粹秘密警察局集中營的經驗.....	48
犯人怎樣受侮辱.....	49
“P—101” 特种集中營或死亡坑	51
鐵托報私仇的受害者.....	54
一年期內的深夜審訊.....	55
要想出監獄，必須燒毀一切橋梁.....	57
對被監禁共產黨人家屬的迫害.....	60
國家保安局竭力破壞犯人的家庭，並使他們的家屬 腐化墮落.....	62

代 序 言

最近，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者除加强政治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帮助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外，还进行着广泛的蠱惑宣傳，以便装出姿态，似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民主、法制、制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已經在那里确立起来了。

但是，尽管铁托集团千方百計向社会輿論隱瞞早已在南斯拉夫盛行的野蛮恐怖手段，它仍然不能完全掩盖住自己的地獄。逮捕、监禁、流放、杀害和迫害的規模是如此巨大，甚至修正主义制度的重要人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是縮小了范围的)存在着反革命恐怖。例如，在1960年3月30日内务国务秘书斯維齐斯拉夫·斯捷凡諾維奇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議会的报告中就順便提到：“普通法庭（不包括国家保安局的机关直接判处的徒刑——作者注）就对进行敌对活动的3454人判处了徒刑，这与去年比較，增加数微不足道。1959年有3004人越过了国境綫”，即使这些毫不符合实际数目的材料也足以說明，在南斯拉夫是以何等巨大的規模在繼續进行着对共产党人和真正爱国者的鎮压。

南斯拉夫的报刊写道，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決議公布后被关进監獄的数以万計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經被釋放了。不知道这有多大真实性。但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玩弄的大詭計，它不仅为了消除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警惕性，而且为了暴露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因为反对派在这些情况下可能认为，修正主义领导已經恢复名誉了。事实表明，一个时期过去后(这一时期再一次证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无可

救药的，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想离开叛卖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利益的道路) 貝尔格萊德的头目們重新开始逮捕从監獄里釋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重新在达尔馬提亚的哥里·奧托克，旧格腊迪什卡和別的地方开办集中营。由此可見，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这次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从而制定了現代修正主义的法典并宣布向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无原則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破坏性的斗争)恐怖手段不仅恢复了，而且采取着巨大的規模。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当铁托制度的假面具被完全揭穿后，他不再需要散布应酬話并宣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了。例如，在1958年底，早先从監獄里釋放出来的人重新又被关进了監獄，其中有門的内哥罗的米沙·謝尔丹諾維奇和1948年曾在監獄里的塞爾維亞恰恰克州康涅維奇村的康斯坦丁諾維奇·德拉甘上校。1957年初，南斯拉夫頒布了“关于行政懲罰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人們即使仅仅有嫌疑也可受到处分。依据这个法令，被告可以被判处2年徒刑至无期徒刑。实行这一措施首先是为了把那些最近刚从監獄里釋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重新监禁起来，因为对于这些共产党人不能提出新的訴訟。白拉什涅維奇·德拉甘就是这样被监禁起来的，他在1956年从哥里·奧托克被釋放出来，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又重新被关到那里。前軍事科学院院长，西班牙国内战争的参加者魯鮑米尔·伏西奇教授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監獄里关了六年后，他在1958年被置于警察的監視之下，然后受到流放。在扎格勒布曾逮捕了許多大学生，因为他們上街示威，要求改善伙食和居住条件，降低食堂食品的昂貴价格等等。特别是那些不管怎样也反对第七次代表大会提綱的人們，很多都被逮捕了。

最近国家保安局机关获得了从来未有过的巨大权限。内务国务秘书发給自己的特务特殊证件，其中規定：“这一证件的持有者有权逮捕或釋放以及运用武器反对違抗者”。

很难描述現今南斯拉夫的監獄里政治犯所遭到的种种折磨。

甚至描写过地獄的但丁·阿利吉里的想像同南斯拉夫集中营里的现实比較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最近我們同一些南斯拉夫的政治流亡者（他們在遭到殘酷的折磨后逃出了铁托制度的監獄和集中营）談过話。我們下面引來介紹給讀者的他們的叙述是如此惊人，人們听了不能不感到忿怒……在这些叙述中沒有任何夸大的东西。其中只包含对于隐藏在铁絲网后的駭人听闻的集中营的普通的如实的描述。这些集中营的基本原則是“对待敌人沒有法律可言”。这一原則类似但丁的地獄的題句，在这地獄的門口写着：“进到这里的人把一切希望都拋棄吧”。在集中营里真是暗无天日，那里实行的是深山密林里的野兽法律，按其狠毒、粗暴和殘酷性來說，甚至超过可憎記憶中的納粹集中营。

下面所描述的在铁托監獄中共产党人的痛苦表明，新近关在哥里—奥托克集中营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遭受到些什么。他們暴露了貝尔格萊德修正主义的真正面目，并表明，貝尔格萊德修正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南斯拉夫人民的鮮血和白骨上的，是建立在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和平而賜給修正主义者的金元的基础上的。

为了夸耀自己对于成千上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爱国者的殘忍和野蛮行为，铁托分子毫无羞耻地吹嘘并声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表现出“革命的能耐”、“思想的坚定性”和“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巨大內在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事实上，他們所需要的以及他們真正見长的，仅仅是警察的能耐，对于罪恶行为和犯罪的頑固，以及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无限忠誠。他們每杀害或折磨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写出任何所謂的理論著作，美帝国主义就賞給他們以美元支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长篇大論地讲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些人从理論上論述馬克思主义；但是南斯拉夫生活中的事实和事情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这里有的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匪徒和拦路截击的强盜。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国家会像铁托的修正主义国家那样显示和夸耀在迫害和消灭共产党人中取得的这种成就。然而，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吧。

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特殊机关

在同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或者同被国家保安局（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工作人员称之为“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铁托修正主义集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手段，并把它們和最残酷、最野蛮的刑訊和难以置信的恶意宣傳和虛伪結合在一起。总之他們追求的唯一目的是：在肉体上消灭并在思想上摧毀反对現制度的共产党人。

在铁托集团叛变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实被揭露以后，铁托集团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是随時間以及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黨員的思想政治修养程度而各不相同的。例如，对于老共产党員、民族解放运动的优秀干部以及高級的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威胁、监禁、挑撥离間等等办法，以便迫使他們公开声明同意铁托的路綫。而对于中級和下层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把他們关进監獄，因为他們組成黨員群众的絕大部分，于是采取了开除出党、派到遙远地区以及分配較低的职务等办法。在那里他們經常受到国家保安局的压迫，国家保安局威胁他們，要他們不仅放棄共产主义立場，而且成为国家保安局机关的特务和奸細。

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內情况的決議公布后，始終忠实于铁托集团的国家保安局仔細地拟訂了消灭南斯拉夫革命反对派的詳細計劃。为此目的建立了所謂“反对共产党情报局斗争总部”，由亚历山大·兰科維奇亲自領導，总部的成員

有現今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內務國務秘書斯維齊斯拉夫·斯捷凡諾維奇，前駐蘇聯大使維爾科·米丘諾維奇，駐匈牙利大使約伏·卡巴契奇，伏約·比利亞諾維奇，前南斯拉夫駐波蘭大使米列·米洛托維奇和南斯拉夫軍隊中特務機關的頭子艾夫托·沙契奇。在擬定刑訊共產黨人—國際主義者的方法時這一臭名昭彰的總部採用了希特勒的蓋世太保的經驗。為此目的首先利用了作為戰俘留在南斯拉夫的蓋世太保的軍官。同時利用了共產黨員和其他愛國者關於他們在納粹和烏斯塔什的監獄和集中營里受到的刑訊的敘述。此外還利用了希臘保皇黨法西斯分子對於愛琴海荒涼的島嶼上集中營里的共產黨人的刑訊的經驗。國家保安局還向精神病醫生徵求意見，以便弄清楚人們心理的堅強性的限度。一切可以用來研究刑訊人的資料都收集來加以仔細研究。此外，“反共產黨情報局分子鬥爭總部”搜羅了大量過去曾為蓋世太保和烏斯塔什服務過的人物，以及在監獄里服刑時受到短期訓練的其他刑事犯。然後，把他們派到聚集着共產黨人的集中營里，假裝是被判罪的共產黨情報局的擁護者。他們的任務是在囚犯中進行分裂活動和挑撥離間。

逐漸地整個國家機構、警察、法庭都準備好了實行一個唯一的目的——同真正的共產黨人鬥爭，以達到消滅南斯拉夫共產黨和建立一個新的民族沙文主義組織，這個組織後來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命名。

監獄、流放和殺害是消滅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主要方法

1948年7月剛舉行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就立即開始大規模監禁和迫害共產黨人。在此以前鐵托集團因為害怕

黨員和南斯拉夫人民，采取了非常狡黠和毒辣的政策。为了贏得時間和完成同共产党人斗争的准备工作，铁托和他的党羽起先通过修正主义的蠱惑宣傳造成一种幻想，似乎铁托集团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只是“一般的誤会”，这些誤会一定会消除，一切“都将得到調整”。例如，在南斯拉夫很长期間內沒有人公开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托采取了似乎是保卫它不受“誣蔑”的立場。铁托的首領們在自己的言論中声明，他們拥护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那时甚至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速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使党轉向公开地位等等。凡是可能揭露铁托分子同帝国主义合作的一切，都非常仔細地隱藏起来。例如，有一段时期，铁托分子公开拒絕接受帝国主义提供給他們的武器。

铁托通过这种政策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造成了錯誤的幻想，欺騙了黨員群众并准备好了对共产党員进行正面的打击。預先經過仔細准备好的为通过叛卖性的托洛茨基修正主义路綫而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在同一時間开始大規模的恐怖手段。作为这一恐怖手段的牺牲者，成千上万个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南斯拉夫人民的忠实儿子倒下了。首先被拋进監獄的是老黨員，这些是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者，曾在苏联呆过的共产党員，其次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南斯拉夫战士，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的老干部和其他人。从1948年起到1952年止，有20万以上的黨員被开除出党，占黨員总数的一半。国家保安局对于被开除的人施加了巨大的精神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压力，以便迫使他們最終地放棄自己的信仰并归附铁托集团。对待他們就像对待次等公民一样，他們沒有权利，处在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并經常遭到逮捕的威胁。

大家知道，还在共产党情报局決議公布之前，铁托就采取了严厉措施反对一切敢于批評他的反馬克思主义、反苏路綫——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路綫的人。例如，他从党内开

除并逮捕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的两位委员——赫布朗、朱約維奇。共产党情报局決議公布后立即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了鮑若·魯莫維奇，巴納·安得列也夫，拉达万·佐哥維奇，杜什科·貝尔斯基奇，拉德·瑞斯基奇，薩伏·茲拉奇茨，布拉哥也·涅什科維奇，除了拉达万·佐哥維奇，巴納·安得列也夫，布拉哥也·涅什科維奇和斯列丁·朱約維奇在悔过书上签名后被釋放出獄外，其他人全体都被关进監獄，然后送到哥里·奧托克的集中营里并在那里呆了漫长的岁月。

还在共产党情报局決議公布之前，許多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就已怀疑铁托的政策，他的民族沙文主义，叛变和狂妄自大已經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而決議毫无掩飾地向南斯拉夫人民揭露了使它們受到損害的悲剧。因此当时許多高級的党和国家干部起来反对铁托及其追随者的政策。但是铁托通过迫害和恐怖手段迫使他們投降，摧毀了他們。例如，正如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所叙述的那样，当格尔策哥維納和波斯尼亚的国家保安局的大部分机关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的決議并拒絕逮捕共产党人时，維尔科·米丘諾維奇（他当时是兰科維奇的副手）就被派到那里。他把国家保安局的軍官一个一个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手枪放在桌上，簡短地問他們：“或者你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綫并完成交給你的一切任务，或者請你吃一顆子彈”。凡是不同意的人立即予以逮捕。

铁托恐怖的浪潮也清洗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許多委员和部长。除了上面已經提到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副部长被开除出党并关进監獄，如：米兰·卡拉法蒂奇，奧勃林·布拉哥也維奇，伏約·謝尔晋蒂奇，查斯拉夫·波若維奇，馬克西姆·果隆諾維奇等等。

八千多名門的內哥羅 共產黨員被關進集中營

在門的內哥羅，以南斯拉夫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鮑若·魯莫維奇為首的政府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幾乎全體被關進監獄。整個政府和中央委員會中只有布拉若·約萬諾維奇和其他兩三個部長轉向鐵托。在臭名昭彰的哥里·奧托克集中營（我們在下面將要講到它）里監禁並遭到刑訊的有門的內哥羅政府的 22 位部長和他們的副手。除了鮑若·魯莫維奇，送到哥里·奧托克的還有下列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門的內哥羅政府的部長：**武科·特姆施奇，尼科·波維奇，布拉若·波羅維尼奇，拉奇伏也·武基契維奇**，等等。在門的內哥羅對鐵托的反蘇政策表現了群眾性的反抗，而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以至國家保安局機關只得逮捕在戰時和戰後入黨的全部黨員。如尼克希奇，蒂瓦利，達尼洛夫格萊德和貝蘭納這些州的州委和地委的全體成員都被關進監獄。鐵托分子逮捕了各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委派別人來代替他們，然而幾個月之後，他們逮捕了由他們重新任命的委員會成員並再一次委派新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而這些人同以前的一樣，在哥里·奧托克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根據某些資料，僅僅在哥里·奧托克就有 8 000 名以上門的內哥羅共產黨員，在其他監獄里他們的人數還要多。

由於這種恐怖手段，在 1949 年以書記伊里亞·布拉托維奇為首的貝洛一波里州黨委會全部都上了山，並號召人民用武裝抵抗鐵托集團的恐怖手段和叛變。因為害怕武裝起義擴展到整個門的內哥羅，國家保安局同起義者開始談判，只要他們投降，就保證他們不受侵犯並得到自由。輕信的人們相信了國家保安局人員的

話，回到了城里，但在那里立即被国家保安局的人包圍起来并就地枪决。

企图逃跑的人也被枪杀了。有些共产党员是由当时門的内哥罗的内务部长薩伏·約克西莫維奇亲自杀死的。**米尔科·什捷潘諾維奇**上校，**米腊舍維奇**少校，**伊里亚·鮑若維奇**上尉和其他許多人就是这样被杀害的。类似当时在整个門的内哥罗流行的恐怖手段是史无前例的。

只要国家保安局机关知道某人送食物給共产党人或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这人就要受到迫害，枪杀在自己家門口或判处十年到二十年徒刑。被逮捕或被消灭的共产党人以前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由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切特尼克(旧南斯拉夫军队的残余——譯者注)和其他同占领者合作过的人来接替，他們想尽一切办法来协助铁托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

在赫尔瓦茨卡相当部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成員以及党和国家的高级工作人員被关进監獄。他們的人数很多，我們只指出**杜什科·貝尔基奇**，**拉德·瑞基奇**，**察尼奇·奧巴齐奇**，**安德台·齐諾丁**，**尼科里奇**博士，**尼諾·卢普契奇**，**維也科·斯莫梁宁**，**米兰·斯坦尼岑**，**施梅·巴列宁**。在达尔馬提亚的錫尼州——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之一——所有佩带“紀念”奖章(1941年)的人都被关进了監獄。在果尔斯克—科托尔和霍尔瓦茨卡河沿岸地带几乎全体党员都被逮捕。在伊斯特尔，省委会全部被捕。相当部分州党委和大部分党员被关进監獄或被开除出党。在斯洛文尼亚，为了回答恐怖手段和逮捕，一部分共产党员上了山。在同国家保安局机关或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之后他們之中有的牺牲了或被抓住，其余的逃跑了。

在波斯尼亚和格尔策哥維納逮捕了政府的許多成員，其中有**奧勃林·斯达洛維奇**，**佩科·巴比奇**，**伏約·卢伊奇**，**科斯塔·格魯巴契奇**，**契杜·米約維奇**等等。薩腊耶沃省委和各州委的許多委員和書記，以及几乎全部共和国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員都被逮捕。

在塞爾維亞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在洛夫乞納開除了 83 個黨員，其中許多人被送到哥里·奧托克。

在 1948 至 1952 年期間關進監獄的將近有 5 000 名軍官，其中有 5 位將軍，30 多位上校，他們主要是旅、師、軍、集團軍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大量被捕和被監禁的主要是在蘇聯學校畢業的軍官。只要某個軍官說一句他不願為反對蘇聯而戰，他就立刻被捕，受到刑訊，並判處 10 年到 20 年徒刑。以法院院長米爾柯·科爾吉奇將軍（他後來在獄中遇害）為首的最高法院成員，以及以韋爾科·日日奇為首的不願對共產黨人—國際主義者進行審判和定罪的總檢察院全體成員都被逮捕。被告不承認贊同共產黨情報局決議是犯罪行為，而認為完全是黨的內部事務。

鐵托是怎樣消滅在蘇聯 生活過的共產黨員的

鐵托和蘭科維奇首先攻擊那些在蘇聯生活過多年的共產黨員，其中也包括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參加者。第一批被投入監獄的有下面一些共產黨員：

尼古拉·考瓦切維奇——南共最老的黨員之一，還在十月革命前作為戰俘住在俄國時就參加了工人運動。尼古拉·考瓦切維奇非常積極地參加了十月革命。後來回到南斯拉夫，被選為過去的南斯拉夫議會中的共產黨代表。以後被迫流亡到蘇聯，用丘德諾夫斯基的假名在聯共（布）黨內工作了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考瓦切維奇被關在法國的集中營里，戰爭快結束時參加了法國的抵抗運動。戰爭結束後去蘇聯與家人會見，然後回到南斯拉夫。因為情報局決議的關係被捕入獄，雖然他並未表示支持這一決議，仍然被判處兩年所謂“社會公益勞動”；而實際上受了六年的嚴厲

監禁。

弗拉基拉夫·澤尔亚維奇——老联共(布)黨員。用阿加貝克夫的假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粮食收购全权代表在乌克兰工作过。他也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他認識铁托时铁托是奧地利军队的一名上士。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們两人都在俄国成了战俘。在这期間他們两人的不同之处是，澤尔亚維奇是自願向俄国军队投降的，而铁托是作为效忠弗兰茲·約瑟夫皇帝打到最后一顆子彈的上士被俘的。

維也柯斯洛夫·斯莫梁——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南共老党员，“紀念”章(1941年)的获得者。監禁前是南斯拉夫駐华沙使館的商务專員。曾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監禁。

德列茲蒂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前一直在苏联。作为南共老党员，为了用自己获得的經驗来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他需要回到南斯拉夫。德列茲蒂奇由于拥护苏联而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由于在獄中受的酷刑，使他在哥里·奧托克的全体犯人面前自杀了。

馬耶岑——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作为苏联的拥护者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上在哥里·奧托克住了多年。

留保米尔·克拉古也維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死于1948年，当时有許多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獄。在監獄中遭受了六年极端的折磨。

伊利亚·伏約維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情报局決議后被監禁，在严厉監禁中服了五年徒刑。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南共最老的黨員之一。流亡苏联之前在南斯拉夫卡拉朱尔捷維奇監獄中呆了十年。在苏联获得了丰富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因表示拥护情报局決議，被国家保安局逮捕入獄，加以严刑拷打，然后被杀害。

安第耶·米利奇——老联共(布)黨員，以軍事顧問身分参加

了西班牙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苏联，曾被委派飞往南斯拉夫和游击队员取得联系。在南斯拉夫領土上不能久住，他和米塔·德斯波托維奇被迫重返苏联。安第耶·米利奇在严冬中冻坏双脚成了殘廢。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担任伤兵协会主席。他也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特拉伊科·米什考夫斯基——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多年的联共（布）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曾经在西班牙当过国际纵队的营长，老革命家。这位共产党员也遭到了与那些不願被套在铁托的反革命战車上的人同样的命运。被捕前是馬其頓共和国政府劳动部副部长。曾被判处两年的“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从監獄中出来后铁托繼續貶低他，使这个老革命家遭受各种困苦，不給他工作和任何生活資料。斯庫普城的居民經常看到特拉伊科·米什考夫斯基沿街叫卖儿童玩具。

巴甫考維奇——也是老联共（布）党员，参加了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南斯拉夫，曾任塞爾維亞共和国部长助理，后任食品工业局局长。被多年关在哥里·奧托克，受到的严刑拷打使他站都站不起来。完全变成殘廢，又沒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巴甫考維奇在出獄后两个月就死了。

馬尔科·斯巴希奇——还在大学生时代就从捷克斯洛伐克到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在那儿成了殘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苏联。他也被铁托判处了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六年严厉监禁。

克里斯提納·庫索瓦茨——南共老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作为南斯拉夫的党代表在莫斯科工作多年。她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受到多年严厉监禁。

拉布德·庫索瓦茨医生——在莫斯科居住了多年。在南斯拉夫由于情报局決議被关进監獄，虽然他并未表示支持該決議。曾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上受了将近六年的严厉监禁。

弗朗尼奇——最老的南共和联共（布）党员之一。在铁托掌握

南共領導之前，曾是南共黨核心黨員之一。被投入獄，判處兩年“社會公益勞動”，實際是多年的嚴厲監禁。在哥里·奧托克集中營中鐵托的警察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在完全殘廢的情況下被釋出獄。

安台·佐利奇——南共老黨員。畢業於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在蘇聯生活了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到南斯拉夫，曾在中央國家保安局工作。在街上被捕，而其家屬根本不知道他發生了甚么事。

伊萬·科爾達——南共老黨員，畢業於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在蘇聯生活和工作了多年。被捕入獄，判處了兩年“社會公益勞動”，但受了約六年的嚴厲監禁。

卡爾托夫策夫——畢業於蘇聯共產主義大學。在聯共（布）領導下做過黨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和在蘇聯建立的部隊一起回到南斯拉夫，戰後是南軍隊中的軍官。被判處兩年“社會公益勞動”，然而受了多年監禁。出獄後在扎格勒布做泥瓦工。

穆斯塔法·貝吉奇——南共最老的黨員之一。在蘇聯居住多年並從事黨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回到南斯拉夫，擔任扎格勒布油脂廠廠長。國家保安局要他發表誣蔑蘇聯的聲明，但他拒絕了，故此被關進監獄。國家保安局的特務傳言說他死在監獄里了。

阿道爾夫·什圖姆夫——教授，南共很老的黨員。這個經過鍛煉的老黨員在蘇聯生活了多年，在那里從事把列寧全集譯成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的工作。同時擔任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德文部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到南斯拉夫，到被捕入獄前一直在貝爾格萊德高級黨校教授辯證唯物主義。這類學校在南斯拉夫於1948年被當作無用之物而關閉。

什圖姆夫被判處兩年“社會公益勞動”，而實際受了五年多的嚴厲監禁。在健康狀況極壞的情況下被釋放出獄。由於蘇南關於雙重國籍的協定，他是共產黨員中唯一有條件保持蘇聯國籍的人。

在1958年4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因为同苏联驻贝尔格莱德使馆有联系，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南斯拉夫。但在动身前什图姆夫病倒了，被送往医院动手术后就死了。许多人认为什图姆夫的死大为可疑。

約有二百个朋友来给他送葬，同时也来了许多国家保安局的特务，负责侦察敢于给老共产党员来送葬的那些人。因为送葬的人数比兰科维奇的警察机关规定的多，所以送葬被看成是反对铁托的大示威。参加送葬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都被国家保安局的刽子手们传去审问。

季米特利·斯坦尼赛夫列维奇——南共的很老的党员。作为政治侨民在苏联居住过多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法国的抵抗运动。被捕入狱，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上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米塔·德斯波托维奇——曾多年生活在苏联，在南斯拉夫侨民中间用的名字是鲍伊科夫。曾是苏联公民和联共(布)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政府轻工业部人事局局长。他也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曾在哥里·奥托克“P-101”监狱服刑，因在悔过书上签字被释放。后来，据国家保安局特务说，他曾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自杀了。

培察尔斯基——前南共中央委员和联共(布)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实际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瑪利·普莱泽尔——法共老党员。作为政治侨民在苏联生活了多年。铁托也逮捕了她并在监狱中关了她很久。

約澤·朗察利奇——老党员，曾在苏联居住，后自愿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受伤。在国家保安局监狱中的审讯使他的健康急剧恶化。出狱后不能作任何工作，完全成了残废。

米尔科·马尔科维奇——老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

学和紅色教授养成所。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曾任上尉。他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受到很久的严厉监禁。

穆斯塔法·特尔鲍尼亚——南共老党员，苏联公民和联共(布)党员。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由于情报局決議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很长时间都受到严厉监禁。

維利姆——被判处几年的严厉监禁，由于刑訊而精神失常。

布拉納·馬尔科維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作为政治侨民在苏联住过几年。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受到了长时间的严厉监禁。

維达克·阿森尼也維奇——南共和联共(布)的老党员——保卫斯大林格勒勳章获得者。在苏联时用的是假名薩列美亭。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却受到几年的严厉监禁。

西里瓦斯特·弗尔梁——南共老党员，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曾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在法国受伤成殘廢，因战功获“战争十字章”。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受到多年的严厉监禁。

在这份被铁托投入監獄和进行多年拷問的老共产党员名单中，常常提到“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和“受到严厉的监禁”。要了解这些字的全部意义，更确切些說，把这些公事上的措詞轉变成真实情况时，要求人們能够想像出史无前例的凶殘行为。在铁托的集中营里，在多年执行“社会公益劳动”的判決期間里遭受折磨的那些人向我們說明了，国家保安局的机关对待老共产党员們的折磨，严刑拷打，描繪出了难以想像的殘暴图景。遭到铁托和兰科維奇迫害的名单很长，这里只提出一部分人并簡短地叙述了一下經歷。現在，讓我們看一下这些人的遭遇和悲剧。

他們都是甚么样的人呢？他們的名字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經歷，但是他們有一个共同点：他們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女，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偉大的工人階級事业，献身于世界青春——共

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为了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他们到处都在和同一个敌人斗争：在南斯拉夫——反对君主制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在俄国拿起武器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沙皇，在西班牙——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行列。他们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住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一方面，为苏维埃人民的伟大建设事业做出了平凡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在那里受到联共（布）党的教育，得到了中等或高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获得了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而当他们祖国解放的那一天，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生活的理想中作出贡献，他们回到了祖国。他们愉快地回到了南斯拉夫，认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伟大理想开始实现了。但是他们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了南斯拉夫人民为之斗争的那些理想。兰科维奇的机关首先向老共产党员们开刀。这是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职业革命家，有十月革命、联共（布）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经历。因为这样，他们就成了铁托实现其反革命计划的巨大障碍。国家保安局用各种办法来摧毁这些人，强使他们同意叛变和进行诽谤。国家保安局机关对他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严刑拷打。举例看看他们是怎样把坚强的共产党员伊什特万·杜鲍什打成残废和害死的。

伊什特万·杜鲍什——南共和联共（布）的老党员和沃伊沃迪纳的代表。

毕业于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在那儿用的名字是伊万诺夫，曾在高尔基市汽车厂工作多年。铁托分子把他判了几年的严厉监禁，随后在监狱中把他打死了，像通常所作的一样，散布的消息说他死在狱中了。但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中的所有犯人都知道这位老共产党员是怎么“死”的。兰科维奇的警察机关像要求其他老共产党员一样，要求杜鲍什承认自己是苏联的间谍，并在“悔过书”上签字。但杜鲍什拒绝放弃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理想，不愿意走铁托和兰科维奇的叛变的道路。因此在审讯期间就对他实行严刑拷问。

判处了几年徒刑以后他被轉到旧格腊迪什卡監獄，在那里繼續拷問他，并在全体犯人面前恶毒地侮辱他。

用燒紅的铁棍燙他，捆起两脚倒吊起来直到失去知觉为止。但是最殘酷的拷打也不能摧毀这个鋼铁般的布尔什維克。铁托分子决定利用变节分子来杀害他，同时用来恫吓其他犯人，因为在这些犯人眼中杜鮑什是坚决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活生生的榜样。为实现这一犯罪行为，旧格腊迪什卡監獄管理处答应釋放这些变节分子，因此后者就热心干起了卑鄙的勾当。起先他們让杜鮑什說斯大林是“叛徒”，当他回答說，不能把斯大林叫作社会主义的叛徒时，变节分子把他推倒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直到他在变节分子脚下断了气为止。这还不够，这些罪犯又在他的血淋淋的尸体上狂跳，弄碎了他的肋骨，肩骨，弄烂了他的头，使最亲近的朋友都认不出他来。看，铁托分子对老共产党员的仇恨和殘暴达到了甚么地步。而最伪善的是铁托分子企图在人民面前把这些卑鄙罪行說成是自然的死亡。許多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的优秀儿女，老共产党员像伊什特万·杜鮑什一样在铁托的刑房中英勇地牺牲了。

下面是新的一章，让我们看看铁托是如何对待軍事干部、党员軍官和爱国主义者的。

軍隊里恐怖的清洗和消灭 党员軍官及爱国主义者

在苏联結束学业的相当一部分軍官和將軍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莫斯科伏罗希洛夫軍事学院毕业，被铁托的劊子手杀害的將軍中，社会上只知道一个上将阿尔梭·約万諾維奇的情况，他曾任南斯拉夫軍隊參謀本部參謀长，大家都知道，在南共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企图偷越国境时被杀害。在他被杀害以后，有

下面一些和他一起毕业于伏罗希洛夫軍事学院的将校軍官被捕入獄。

布兰科·泡利亚納茨——中将，被判处十七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在監獄和集中营里他被拷打和折磨成殘廢，精神也失常了。

久里奇·莫奇罗——上校，战时是总參謀部防卫营营长，战后是铁托卫队队长。被判处十二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拉杜洛維奇·斯洛鮑頓——上校，也被判处十二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拉吉奇·斯拉夫科——中将，情报局決議发表后突然死亡。人們只能猜測其死因。

毕业于伏龙芝軍事学院的校尉軍官中，被捕和受审的有下面一些同志：

薩沃·斯塔諾也維奇——上校，由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功绩曾获“人民英雄”称号。被判十二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米尔柯·巴特利采維奇——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稚郭什·扎里奇——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杜欽諾夫·伊万——中校，曾参加西班牙內战。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达尼洛·朔洛維奇——上校，被判十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薩利赫·拉頓齐奇——中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久柯·比基茨基——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阿勃拉莫維奇·米兰——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米尔科·什切巴諾維奇——上校，在获釋后被杀害。

波列克西奇·莫奇罗——上校，被判十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米洛什·馬諾伊洛維奇——上校，被判极刑，后来，铁托分子为了宣傳目的把它改为无期徒刑，以便向人民說：“看吧，我們是多么人道的人，我們沒有杀死过一个情报局決議的同情者。”米洛什·曼諾罗也維奇确实未被枪杀，但在到圣格里哥里那島的集中营后立即被杀害了。在那里把他打死，把尸体弄烂，以致沒有一个亲人能认出他来。这种死也被铁托分子說成是自然死亡。

在伏龙芝軍事学院毕业的十七个上校和中校中有十一人被捕，被判长期徒刑及强迫劳动。

毕业于苏联其他軍事学校的軍官被捕的有：

馬依岑·杜山——上校，被判十六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伏卡吉諾維奇·伊利雅——中校，被判九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卡拉日奇·沃約——中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久拉雪維奇·沃約——中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捷米尔·鮑沃維那——中校，被判十六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伊利亚·卡列維奇——中校，被判九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科伊奇·魯鮑——少校，被判十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謝什里雅·戈伊科——上尉，被判八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莫达柯維奇·布兰科——上尉，被判数年徒刑。

伏欧謝維奇·米萊——上尉，被判八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原苏联軍事学校的學員**米萊·曹拉茨、斯拉夫柯·李察宁、瓦米吉·斯台凡、波波維奇·米兰、格奧尔基也夫斯基·馬那和格里克尼奇·基沃塔**也被判罪。

逮捕这些軍官清楚地說明了，铁托和兰科維奇不仅想清除那些老的黨員干部，还想清除那些在苏联高等軍事学校受过教育，在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丰富的政治經驗的軍事干部。铁托分子把这些軍官判了重刑，想以此来恫吓大多数不願叛变的軍事

干部。到 1953 年底約有五千名黨員軍官被捕，這一事實本身清楚地說明了南斯拉夫軍隊中過去的情況和將要出現的情況。據估計，僅被捕的約五千名的軍官和將軍們就被判處徒刑共五萬年以上。

五千名關在獄中的軍官

上面我們說明了，鐵托是如何清算那些在蘇聯高等軍事學校畢業的高級軍官的。但是逮捕並不只限于這一些。被捕的約有 5 000 名軍事幹部——各級軍官。稍微講一下南斯拉夫軍隊的高級幹部。

南斯拉夫軍隊的領導幹部絕大部分都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參加者，是工人、農民和人民知識分子的子弟。這是些信任蘇聯和對解放祖國的鬥爭有信心、為紅軍的榜樣所鼓舞的人們。對“俄羅斯母親”的傳統的愛在加強南共幹部的事業上也起了良好的作用，這在軍隊中也得到了反映。而南斯拉夫和蘇聯戰士為解放南斯拉夫這一共同的事業而獻出的鮮血，使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堅信，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們和蘇聯分開。

這些幹部清楚地懂得，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鬥爭之所以取得勝利完全是紅軍勝利的結果。由於這個緣故，鐵托及其幫凶在共產黨情報局作出決議以後的一個短時期內仍不得不繼續說蘇聯和紅軍的好話。但是當偽善和欺騙的手法毫無所獲之後，就改用暴力了。第五次代表大會提出轉向消滅軍事幹部。請看在南斯拉夫軍隊中是如何朝這方面準備的。在有約 200 名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五軍指揮部和指揮部直屬組織的代表會議上，政委沃約·科瓦切維奇將軍讓諾維茨·德亞諾維奇上尉表示態度，雖然後者並沒有要求發言，因為在這以前他已在自己的黨組織里表示過支持共產黨

情报局的決議。在科瓦切維奇將軍的逼迫下德亞諾維奇只是說，他同意決議，沒有什麼可補充的了。以後科瓦切維奇將軍便對德亞諾維奇上尉說：“你是個敗類、下流的东西和叛徒”，並命令 KOC（軍事偵察機關）負責人朵曼·伏西奇中校立即逮捕德亞諾維奇。命令當場就執行了。德亞諾維奇上尉就在黨的會議上帶上手銬被押進了監獄。德亞諾維奇沒有被選為代表而被叫去開會這一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說明，逮捕他是事先準備好的，其目的是恫吓參加代表會議的其他人。在這種場合本來是沒有必要事先準備好手銬的。第二天，根據鐵托本人的命令德亞諾維奇被剝奪了軍階，並被送往哥里·奧托克的集中營，好幾年來一直遭到拷打。沃英·波波維奇將軍（以後是鐵托衛隊的政委）在準備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期的行為也很說明問題。在尼什召開的第 3 軍區黨的會議上，他宣稱將槍決所有即使敢於說一個字反對鐵托的人。

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中還採用了撤消當選的黨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辦法。例如在代表會議前夕撤消了斯列多耶·烏羅舍維奇將軍、盧波·伏紹維奇教授和其他許多共產黨人的代表資格，因為鐵托分子不相信這些人在代表大會上會支持他們的叛變路線。盧波·伏紹維奇是老共產黨人，在階級敵人的監獄里他曾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而在民族解放鬥爭時期失去了三個兄弟。在撤消這些人的黨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同時，卻把忠實於鐵托的人當作代表派往代表大會。由於實行這種路線，在人民國防部儘管有許多將軍和軍官，黨組織卻選舉了布基薩夫列維奇·雅萬嘉（約瑟夫·布羅茲現在的妻子）當代表，而當時在參加代表會議的人們中間誰也不認得她。

在軍隊中就是這樣準備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在其他組織中也是以類似的辦法進行準備的。代表大會大肆攻擊共產黨人。軍隊中的逮捕浪潮是堅決無情的。我們手頭有很長的被捕軍官的名單，但是為了使讀者不致太累，我們只提出某些高級軍官的名字。

在被捕的 5 000 名軍官中有 5 名現役和 3 名預備役將軍。現

役將軍是：久科·米腊舍維奇少將，米尔柯·科尔吉奇少將，韦尔科·日日奇少將，布兰柯·泡利亚納茨中將和布兰柯·彼特里切維奇少將；預備役將軍是：拉德·吉基奇中將，杜施柯·布尔基奇中將和恰尼查·奥巴齐奇少將。斯拉夫柯·罗地奇將軍在可疑的情況下死亡，而斯列多耶·烏罗舍維奇將軍和拉多凡·伏卡諾維奇將軍被安排到次要的职位上去。

在 1948 年被捕的上校中有：弗拉基米尔·达普切維奇——南斯拉夫軍隊宣傳鼓動部部長；杜克朗·伏卡蒂奇——南斯拉夫軍隊坦克學校教官；薩伏·伏克切維奇——《人民軍報》社長；布拉哥也·科姆涅諾維奇——高等軍事學院後勤部主任；亞涅斯·耶澤謝克——駐羅馬武官；布兰尼斯拉夫·安蒂奇——炮兵學校教員；米連柯·斯托亞科維奇——南斯拉夫軍隊軍事政治學校政委；波約·伊万諾維奇——第 3 軍區後勤司令官；魯波·尼基奇——南斯拉夫軍隊軍需部主任；米奧德拉克·洛吉奇——南斯拉夫空軍司令部科長；米里亚·拉科維奇——南斯拉夫軍隊高級軍事法院審判員；拉德·米卢蒂諾維奇醫生——某軍衛生部主任；阿历山大·巴巴洛夫斯基醫生（职位不詳）；卢波·伏紹維奇——在政治部工作；米留金·达普切維奇——師長；米里伏也·格罗茲多尼奇——師長；諾瓦克·貝尔齐奇——第 5 軍參謀長。

1948 年被捕的中校中有：斯达諾也·布拉約維奇——南斯拉夫軍隊政治部鼓動科長；伏卡申·米利奇——南亞得里亚軍區政委；采多·約万諾維奇——師政委；斯列騰·巴列維奇——師政委；拉基奇·布拉托維奇——師政委；潘多·西米奇——師政委；內納德·瓦西奇——波斯尼亞和黑賽哥維那國家保安局第一科科長；萊姆佐·杜腊諾維奇——波斯尼亞和黑賽哥維那人民保衛部的一個科長；斯多列·科瓦切維奇——一個科長；博若·伊凡諾維奇——黑山警察局長；克尔斯塔伊奇·維尔科——黑山警備司令；維尔科·托米奇——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家保安局工作人員；杜卡·波若維奇——機場負責人；伏約·久腊謝維奇——高等

軍事學院教員；沃英·亞涅維奇——師軍事檢察官；伊利亞·伏卡迪諾維奇——高等軍事學校教員；杜山·卓洛科維奇——人民保衛部司法科工作人員；弗拉多·拉基奇——最高軍事檢察院工作人員；托莫·安吉奇——第6軍軍事商業企業經理；內几柯·馬爾蒂諾維奇——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人民議會任職；貝塔爾·巴諾瓦策——塞爾維亞國家保衛局工作人員；拉多萬·伊利奇——南斯拉夫軍隊高級軍事法庭審判員；拉杜·麥德尼采——（職務不詳）；彼羅·布基薩夫列維奇——扎格拉布炮兵學校教員；阿歷山大·特諾菲莫夫——高等軍事學院教員；莫蒙契羅·哥洛維奇——師參謀長；伏可薩夫·鮑什科維奇——比也羅一波列區國家保衛局主任；米爾可·鮑什科維奇——貝爾格萊德市衛戍部隊司令；塔巴科維奇·米蘭和喬治·日夫科維奇——師參謀長；維爾可·貝哥維奇——軍部的一個科長；巴施可·布班尼——（職務不詳）；久里奇·拉多米爾——塞爾維亞國家保衛局工作人員；杜山·卓皮奇——團長；沃約·卡拉吉奇和米洛什·朱里奇——炮兵部隊指揮員；伏卡金·約萬諾維奇——工兵部隊指揮員；拉紹·伊格尼亞托維奇——炮兵旅長；布朗科·科瓦切維奇——團長；約佐·科瓦切維奇——（職務不詳）；采羅維奇·德拉甘——團長；拉伊可·古貝里尼奇——警衛團政委；鮑施可·庫里亞察——團長；米拉萬·米拉諾維奇——通訊團團長；盧波·波羅維尼奇、拉多伊采·塞庫利奇和拉佐·波彼沃達——團長；沃英·策羅維奇——高等軍事學院教員；約瑟·拉加爾——師參謀長；維爾科·斯捷凡諾維奇——人民保衛部科長；久科·斯特羅斯基——波斯尼亞和黑賽哥維那人民保衛部科長；伊利亞·卡列維奇——師參謀長；德拉基·約萬諾維奇——高等軍事學院教員；米哈伊羅·伏伊科維奇——人民代表；鮑格唐·熱爾科維奇和諾沃·朱基奇——（職務不詳）；托莫·扎里奇——第3軍區科長；德拉基·菲利波維奇——扎格拉布軍區政治部指導員等等，等等。

所有軍官都無例外地被判處重刑。他們被判處5—20年的

严厉的徒刑和强迫劳动、无期徒刑和死刑。在判决书中无耻地指出，犯人之所以判处这种重刑和长期徒刑是为了使他們有足够的時間来反省自己的背叛行为。

下列軍官被判处死刑

米洛什·馬諾伊洛維奇上校，烏可·米利基奇少校，米列·日夫科維奇上尉，薩沃·斯托雅諾維奇中尉，布多·托米奇中尉，德拉哥斯拉夫·馬尔科維奇中尉，拉都列·姆尔斯基少校，弗拉多·塞庫羅維奇中尉，伊万·德菲安采夫斯基少校，斯坦科·策尔文科少尉，德拉哥·法边納茲中尉，維利沙·馬尔科維奇上尉（只因为他在法庭上喊“斯大林万岁”），拉佐·拉佐夫斯基（战时曾被法西斯分子判处死刑），米兰·特尔鲍維奇上尉，久罗·姆連諾維奇上尉及其他許多人。

某些被判死刑的人后来被人民議會主席团专令赦免，以显示制度的人道。严厉地判处死刑，以及有时搞假枪决，其目的是增加犯人精神上的紧张，使軍隊中的动摇分子畏惧和屈服。犯人們一月又一月地长期等待对赦免的答复。

从軍隊中被捕人員的巨大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铁托集团所制造的那种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和恐怖，这是针对所有那些敢于批評或企图表示反对其政策的人的。

然而，尽管修正主义分子早就埋葬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們揚言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存在着党内民主。铁托的主要走狗——亚历山大·兰科維奇在南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重談其党内民主，按照他的說法，好像这是建立在从下面来的和从上面来的意見自由斗争的基础上的。

在铁托私人卫队中的逮捕

然而逮捕的浪潮并没有就此结束。铁托和兰科维奇逮捕了所有有一点点被疑为可能反对其修正主义政策的共产党人。逮捕也扩大到铁托的私人卫队，这个卫队的规模和实力比过去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卫队要大得多。在1948年该卫队由两个警卫师组成，每师有3个团和一个负责内宫的警卫团。此外，铁托还有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军官连。在卫队中有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兵团和空军团。卫队由铁托本人直接指挥，而人民保卫部和它毫无联系。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卫队各单位里是如何进行清洗的，这是南斯拉夫的流亡者对我们讲的。

特别军官警卫连政委**拉伊科·古贝利尼奇**中校由于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被判处8年徒刑；特别团政委**鲍日维奇**少校被判处14年徒刑；特别团团长**米罗拉德·扬科维奇**被撤职；特别营营长**沃约·阿布腊莫维奇**中校被捕，而出狱以后解职养老；铁托的私人医生**波若·波若维奇**少将复员了；第一政治部少校**德维奇**被判处12年徒刑；卫队上尉**米里奇·卡拉吉奇**被判刑9年；卫队检察官**久尔基奇·拉多米尔**少校——4年；KOC（军队侦察机关）军官**维多也·伊万诺维奇**少校——14年；军官警卫连**弗拉多·巴甫洛维奇**上尉——10年徒刑；**杜山·比基奇**上尉仅仅因为他在党的会议上在回答是否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问题时说了一句：“我赞同俄国人”，被判处2年“社会公益劳动”，然而服了6年徒刑。**安台·伏克曼**少尉（军官警卫连）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伊万·卢什诺维奇**少尉（军官警卫连）和其朋友**伏克萨尼克**一起被控准备谋杀铁托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警卫营营长**库里利奇**上尉企图逃跑，在边境被打死；**西莫·萨沃维奇**少校被开除出卫队；特别军官连**涅德尔**

科·吉雅伊奇上尉被开除出卫队，以后又被捕并被判处几年徒刑。

几乎所有在统帅部警卫营服役的军人(当时约 500 人)都被监禁在狱中或被开除出卫队。铁托的副官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尼基采·皮尔拉副官，据国家保安局的消息，是自杀了；拉德·利斯塔诺维奇上校解职养老。战前入党的鲍什科·卓利奇少校，1941年以来就是铁托的副官，被判处死刑。以后改为无期徒刑。他被判刑只是因为战争刚结束时毫无恶意地向苏联电影工作者谈过铁托和丘吉尔第一次会面的情形。

铁托任命了新的、忠实于他个人的人来代替老副官，而不管他们过去如何。例如，前巴维尔·卡拉朱尔捷维奇王子的侍从宪兵米兰·杰杰尔成了他的第一副官。谁也不敢说他曾是个宪兵！例如米兰·第米奇中校就因为说过类似的话而被判处 12 年徒刑。

一万二千名军官退居预备役

就这样，铁托及其帮凶在南斯拉夫军队中进行了清洗，赶走了最有战斗力的、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军官。然而恐怖手段并没有使刽子手如愿以偿。为了收买军队和鼓励其队伍中的升官思想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倾向，1948年以后铁托扩大了军官的特权，提高他们的官阶，广泛分发勋章和大量封给“人民英雄”称号。这一称号也给予了某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以胆小出名的军官们。例如巴奈·科基奇，他在和法西斯斗争中毫无战功可言，相反地却和共产党人进行了斗争。在战争结束 10 年以后，大量授予人民英雄的称号，广泛提级，给以奖赏，发给勋章和 1941 年纪念章，这都是 1948 年以后在军队中出现的严重状况的结果。但是，这在那些在战时确实表现为英勇战士的军官中间起了反作用。

1948 年以后铁托及其帮凶开始怀疑几乎所有参加过民族解放

战争的军官，虽然在军队中留下的只是些已经声明准备甚至和苏军作战的军官（铁托分子把苏军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仿佛它是南斯拉夫独立的主要危险）。虽然军官们作了类似的声明，但是国家保安局并没有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把他们留在军队中仅仅是因为怕军队瓦解。

现在铁托分子极其关心在军事学校培养一批新的青年军官，按照他们的看法，这些人是会忠实于铁托的制度的。在这方面他们是做到了。用这种办法训练出大量军官干部之后，铁托分子便让相当大的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复员或退职养老。从1948年到1955年有12 000名军官转入后备役，这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像铁托分子所竭力说成的那样，是“社会集体对在战争中耗尽精力的人的关怀”。

哥里·奥托克——恐怖和死亡！

前面我们叙述了铁托为清算老共产党人和军事干部而采取的手段。叙述了逮捕的情况，提出了人名，介绍了他们被判处“社会公益劳动”和长期徒刑的原因。但是这些人到哪儿去服刑呢？

现在我们写到铁托制度中最黑暗的一页，或者说，那些能揭示南斯拉夫特殊社会主义的实质的东西。我们来打开监狱和杀人的集中营的一页。毫无疑问，为了描绘这些，需要有作家的手笔。我们现在对我们听到的一切的描述，和实际情况比起来将是非常贫乏无力的。我们将列举事实，并且只举事实。显然，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描述这些集中营、正是描述这些骇人听闻的集中营中的一个可以称之为地狱而无愧的集中营的话，那么这种描述可能会是我们时代最震撼人心的描述之一。

铁托和兰科维奇幼稚地争辩说，因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而判处

共产党人服“社会公益劳动”并不是判处徒刑，而只是輕微的人道的行政措施，目的在于改造人。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許多公民形式上被判处两年的“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上却服长期的、严厉的监禁，或被消灭掉。铁托的法律規定，犯人只有在证明自己已改好时，才能釋放，換句話說，这就是只有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叛徒才能被釋放。不屈服的共产党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铁托分子同时还辯白說，通过行政程序判刑的共产党人，在偵訊拘留之后沒有送往監獄和集中营，說軍人沒有被判处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铁托分子过去和現在都反駁說，哥里·奥托克既不是監獄，也不是集中营，說南斯拉夫根本就沒有集中营。铁托分子同欺騙是分不开的，他們就是欺騙的化身。铁托分子，这就是恐怖、挑畔和欺騙。一方面，他們說，他們修正主义的国家是最人道的，而实际上他們建立了世界上最专制的警察国家之一。其次，他們宣傳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在恢复資本主义；他們大談民族自由，其实这是在公然嘲弄被他們奴役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他們建立許多監獄和集中营，但不用原来的名称，却称之为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是妥卜切德尔的众神在改造垂死的母羊。然而哥里·奥托克，这不是布里奥尼，正像但丁的地獄不是天堂一样。我們所遇到的从哥里·奥托克地獄中得救的人們訴說了对犯人所施行的駭人听闻的折磨，只有作恶成性的匪徒才能建立类似的集中营。

当說到哥里·奥托克时，我們指的是两个集中营：一个在哥里·奥托克，另一个在圣格里哥里耶，这是亚得里亚海上相隔 3 英里的两个小島。

在哥里·奥托克集中了大批因共产党情报局決議而被判刑的共产党人。这个小島面积約 12 平方公里。其四周有卫兵的汽艇守卫。每只汽艇都和这个荒島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之无法看清島上的情景。这个島是如此的干燥，只有在石头縫中才能勉强找到一点儿草。全島都修筑了工事，沿海岸架設了許多机关枪，守卫着各主要通道。島上所有的营棚都用帶刺的铁絲网圍着，在崗楼上还

有哨兵守望，这好像是仿照納粹的集中营建造的，或者像在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关闭西班牙战士的法国集中营一样。逃出这个地獄的人們說，在这些集中营之間的唯一差別是：如果說很多犯人能从法国集中营中逃出的話，那么铁托的集中营却建造得如此坚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逃出这个小島。例如，1941年就加入了对占領者的斗争的維尔科·姆尔达科維奇曾經逃到了拉布島，但在那儿又被捉住并重新送回集中营。把他抛进了地下室，进行拷打，然后杀害了。在脖子上捆上石头后把尸体扔在海里，但是后来浪潮把尸体冲到島岸上来了。犯人們认出是他并把他掩埋了。必須指出，掩埋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在很长一段时間内这是唯一的一次。

尽管这是道地的集中营，然而敢于說自己是在集中营中的犯人都遭受最严重的惩罚，因为他的說法和铁托—兰科維奇所定的官方名称不符，他們把这种大規模的集中营叫做：“劳动所”，或“大理石”工厂。而实际上它是道地的折磨共产党人的場所。

在哥里·奥托克和圣格里哥里耶島上有4个集中营，3个男的，1个女的。4个里面有一个叫做“P-101”的，它具有最森严的監獄的一切特点，而不像个集中营。其中監禁的主要是南共的老干部和一些参加过西班牙斗争的人。其中还有大部分在苏联呆过的老共产党人。

上述各集中营的内部制度是各色各样的。在这些集中营里都把让新来的犯人“通过排队”当作教育措施。兰科維奇的劊子手們用以迎接新犯人的“排队”是怎么回事呢？

奸細活动——铁托集团 的主要工具

在談“排队”以前，我們不得不回过头来讲一讲。

当国家保安局看到某一共产党人坚持工人运动的路綫，当它肯定借助于狐狸的狡猾伎俩不能使他加入反苏运动，这时候它就把它逮捕起来。逮捕（在逮捕时經常是非常粗暴的）之后，被捕者立即被隔离起来。

为了使犯人屈服和迫使他們承认国家保安局机关所需要的东西，在审前拘留期間使用一切手段，如說服，施加压力，餓肚子，毒打以及最凶狠恶毒的拷問。例如經常施行鼻孔灌水，或所謂“西班牙式游泳”，通电，在性器官上縛上磚头等等。如果国家保安局人員用这些手段不能使犯人屈服的話，那时就派奸細到他的牢房里去，其任务是和他接近，逐漸地向他打听国家保安局所需要的一切。数月、甚至数年处于隔离状态的犯人不能坚持緘默，而当他一开口讲话，就立即落入从变节的犯人中間挑选出来的奸細的圈套。通常奸細工作都是由被捕者的熟人或朋友来进行的。

有时把两个很熟的而又都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的被捕者关在一个房間，在房子里装上偷听器或磁性录音机，記下他們之間的談話。然而国家保安局并不滿足于把“罪行”强加給犯人。这仅仅是第一步。国家保安局首先特別追求的是让犯人放棄自己的信念，千方百計地力图在道义上和精神上使之屈服，使他們成为奸細特务，然后利用他們去改造其他犯人，或出獄后去干間諜工作。

铁托集团为实现其阴險目的，經常設法在道义上瓦解犯人，培养他們进行間諜活动以互相監視，使之互相誹謗，并用这种办法使他們爭吵得無論在獄中、还是釋放以后都无法和解。为准确地达到上述目的，国家保安局机关通常是把道德上不坚定的犯人爭取到自己这一边，然后利用他們去实现所謂“改造”犯人的罪惡計划。

国家保安局瓦解犯人的全部工作是从审前拘留时就开始了的。一开始国家保安局在監獄中关进几个犯人，把他們算作“共产党情报局分子”，从烏斯塔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时期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法西斯匪帮的成員——譯者注）和切特尼克这些犯

人中間挑選一批奸細組成專門的訓練班，這些人以後就被送往折磨共產黨人的各監獄。被捕的軍官如果同意做奸細的話，就答應給以自由。這樣，還在審前拘留時期就已經通過各種辦法建立了奸細小組，雖然為數不多，但已足夠讓國家保安局機關以後在集中營中採取大規模的內部恐怖措施了。

法庭審訊是最常見的侮辱。除兩、三件例外，所有的審訊都是秘密進行的，除了被捕者以外，參加的是：國家保安局指定的審判委員會成員、檢察官和辯護人。懲罰的輕重是國家保安局事先規定的，某些犯人還接到起訴書，書中指出其罪行和預定的刑罰，而法庭的判決和國家保安局機關預定的是一樣的。

被判刑的軍人被送往舊格臘迪什卡的監獄服刑，而通過行政程序判刑的公民則被送往哥里·奧托克從事“感化勞動”。被軍事法庭或人民法庭判刑的婦女被送往薩瓦河上的萊亨堡。某些按照行政程序判刑的人，起初被送往聖格里哥里耶島，然後送往哥里·奧托克。

通往地獄的道路

偵訊之後國家保安局機關就把犯人大批集中起來送往集中營。在前往哥里·奧托克或聖格里哥里耶島時，犯人們被成對地銬在一起，裝在專門的警車上，送往火車站。在押進車廂之前，在站上他們被關進特設的小屋子裡，好多人被憋得昏倒。然後從這兒用塞得滿滿的、沒有水和食物的囚車運往巴卡爾——亞得里亞海北部的一個小城市。通常火車是在夜間——即疲憊不堪的囚犯已睡着的時候到達指定的地點。用鞭子、棍子和拳頭把他們弄醒。從車站到碼頭沿路兩旁都站滿了國家保安局的軍官和警察。惶然不知所措的犯人想儘快地通過這個行列，但是往往失足跌倒。國

家保安局人員和警察用皮靴朝他們臉上又踩又踢，催趕他們快些走完這段路。在輪船上先点了名，然后把他們扔進3—4米深的底艙。某些人不知為什麼被叫到上面去，然後重新扔進底艙。由於犯人是成對地銬在一起的，因此當其中之一被推往底艙時，他是懸掛着的，因為那時候第二人仍在底艙上面的甲板上受着毒打。在犯人受够了折磨和毒打以後，一批國家保安局人員和警察來到了底艙，在到達指定地點以前的整個航行期間一直不斷地侮辱他們。這些匪徒們一邊毒打犯人，一邊問道：“在鐵托的南斯拉夫你們還缺少什麼？”而如果犯人是年輕人的話，就問他，“在戰火紛飛的1941年時你在哪兒呢？”接着又繼續毒打，犯人們失去了自制力，甚至不知道周圍出了些什麼事情。犯人們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波折和磨難，最後輪船終於把他們運到了苦難的島嶼。在那裡他們是否能得到即使是一點點安靜呢？肯定地說，不能，因為還在底艙他們就聽到岸上傳來的號叫聲。當他們準備出底艙的時候，一批手操棍子、皮鞭和馬鞭的由奸細中挑選出的打手登上了輪船，並就地開始毒打犯人，最卑鄙地侮辱他們。奸細們朝犯人頭上、背上、腹部痛打，用腳又踢又踩。血從嘴巴、鼻孔和胸口像泉水似地流出來。每一個打手都力圖更多地痛打犯人，以此向國家保安局的監視者表明自己願意和“敵人”作戰。“改造所”就是這樣來迎接犯人的。

請看臭名遠揚的“排隊”

這不過是開始。在監獄里又点了一次名。那些被叫了名字的犯人立即從監獄里爬上來，然後吃力地走到岸上；在這裡，等待着他們的是連魔鬼都臆想不到的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犯人在這裡排成相距一至兩米的两列橫隊。新來的犯人走過兩列橫隊時，一定要受到站在兩列橫隊中的每一個人的打擊。這就是臭名遠揚的

“排队”。“排队”是由所謂“犯人自治管理中心”指揮的，而这个“中心”又是由集中营主任、审讯人員、特务和在道德上、思想上墮落成为密探、打手和杀人凶手的犯人組成的。新犯人都必須低着头走进“队伍”，审讯人員和拿着自动步枪的警察則在“队”的两旁来回走动。有些审讯人員走进了徒手犯人的橫队，向他們說明打人的方法。多数犯人都在两列橫“队”中間倒下了，有的甚至當場死去。这全部迫害自始至終夹杂着吓人的喊叫和怒罵：“站起来，站起来！打死匪徒！打死斯大林的走狗！打倒人民的叛徒！”等等。而最大的諷刺就是特务的叫喊：“社会主义的改造措施万岁”，“铁托——現在的列宁万岁！”“我們是铁托的——铁托是我們的！”犯人通过“队伍”以后，往往丧失理性。他們想像不出是誰打他們和为什么打他們，也弄不清他們周圍发生的事情；他們所感觉到的只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許多不止一次看見过死亡的軍官和政委都低下头来，因为这种惨景实在太恐怖了。

甚至在經歷过“排队”20天之后，犯人們还不能互相辨认。他們的面孔尽是伤痕，肿得高高的，形状都变了，眼睛变得很小、深深地陷了下去。有許多犯人被打掉了牙齿，打破了鼻子，打断了肋骨。不过这还不是一切。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后來說，还不如在通过“队伍”时死掉，免得还再受沉重的痛苦。

哥里·奥托克的集中营管理处常常組織“排队”，而且經過精心的策划。主任本人和审讯人員都严密地注視着特务和犯人怎样准备“迎接”自己的新难友，看他們是否参加毒打犯人的勾当。的确，許多犯人只是抬起手来，又放下去，装作打那些新来犯人的样子，至于那些特务和审讯人員、警察和哥里·奥托克集中营主任办公室的工作人員等，这帮劊子手可就毫不留情了。他們非常殘酷地毒打新犯人，以致許多新犯人連“队伍”的中途都走不到，因为那两列橫队排得弯弯曲曲，所以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不能迅速通过。这种“队伍”有时长达两公里。在通过“队伍”的时候，首先支持不住的就是那些在来到哥里·奥托克之前在偵訊監獄的隔离所內关

了一两年的犯人。他们由于饥饿和过去受了种种严刑拷打而虚弱不堪，所以一走进“队伍”就摔倒了，而在受到第一阵打击以后就失去知觉而晕倒在地上。在后面的犯人都想少挨打，所以踏着他们的身体快跑过去。在通过“队伍”以后，那些失去了知觉和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新犯人被送进诊疗所去进行“急救”。审讯人员和监狱的医生就根据对犯人进行“救护”的情况来确定“排队”的效果，而且考察他们之中有没有假装重伤的人。经过这番“考核”之后，当那些不幸的被折磨的人恢复了知觉以后，如果他们还能够站得起来或者勉强行动得了，就被送进牢房去，他们在那里又受到一番新的“接待”。根据集中营管理处的指示，对于老共产党员、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军人，都配有专门的特务，这些特务的职责就是要把自己包干的犯人打得比其他的人更厉害，就是说要打个“臭死”。在某些场合之下，组织对新犯人的“排队”和“接待”时，以集中营主任为首的国家保安局的官员都亲自出马，而且像布拉托维奇、多米亚诺维奇、罗什特戈拉奇等这样一些大刽子手都亲自参加。例如，当一批老共产党员来到臭名远扬的哥里·奥托克“P—101”监狱时，就组织过一次这样的“排队”。这种场合是不吸收变节分子参加的，以免有活的见证人。当把一大批高级军官由旧格腊迪什卡转移到“P—101”监狱来时，情形也是这样，“迎接”这批军官的只有监狱长、国家保安局的官员和狱警。他们命令这批军官穿过“队伍”，在这里，让他们戴着镣铐（他们来时就戴着）挨打，从下船的地方起，一直打到监狱门口。在这一批军官中有将军四人，久科·米腊舍维奇、韦尔科·日日奇、布兰科·泡利亚纳茨、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上校三人：弗拉基米尔·达普切维奇、莫姆契洛·科里奇、萨沃·伏克切维奇；中校三人：内纳德·瓦西奇、莱姆扎·杜腊诺维奇和斯特罗茨基·久科；少校两人：米累塔·佩特罗维奇、迪米特里埃·安德里奇和其他许多人。这次“排队”是最野蛮的“排队”中的一次。

前《人民军报》社长萨沃·伏克切维奇就因经受不住这种“排

队”而死去了，更确切些說，他是被铁托—兰科維奇匪帮的劊子手活活打死的。因为伏克切維奇长期被关在旧格腊迪什卡監獄的隔离所內，只能吃到一点面包和水，已經被飢餓和拷打折磨得瘦弱不堪，以致在路上要由别的同志架着走。尽管他已处在死亡边缘，国家保安局的官員在“排队”时还是拳棍交加，把他毒打得如此厉害，以致他一到“P—101”監獄就死去了。他說，在旧格腊迪什卡監獄里他遭到了各种野蛮的严刑拷打，因为国家保安人員不能从他口中得到陷害一些过去的軍官的材料。但是薩沃·伏克切維奇宁願坚貞不屈而死，而不願忍辱偷生，不願为了減輕自己的处境而贓害別人。米洛什·馬諾伊洛維奇中校也是这样英勇不屈而死的。他本来被判处死刑，后来被赦免而送到了圣格里哥里耶島。他在通过“队伍”时被毒打得如此厉害，以致当时就死去了，而铁托分子却硬說他是自然死亡的。在監獄当局叫做“迎接——排队”的这种场合下，許多共產黨員失去了生命。

作为一种所謂“改造”措施的“排队”，不仅在新犯人来的时候进行，而且在集中营里面也常常实行。例如，在“P—101”監獄里几乎每天、甚至晚間也实行“排队”。“P—101”監獄长办公室在进行“排队”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无法利用老共產黨員来实行这项“改造”措施。因此他們不得不强迫一批屈服了的犯人站好，借助这些人来迫使老共產黨員参加“排队”。但是国家保安人員即使借助这批人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們又弄来了一批新人。这样作仍然沒有結果。最后就弄来了一批怙恶不悛的罪犯分子和暴徒，他們之中有安格耳科·特韦尔特科維奇和曾經在法西斯軍隊里打过仗的图戈米尔·科瓦契奇，在东方战綫上同紅軍作战时受过伤的腊伊科·科帕弗尼克，在旧格腊迪什卡監獄参加过杀害伊什特万·杜鮑什的尼科拉·普累加什以及其他許多人。在上述这些从来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的罪犯分子的帮助下，監獄长办公室終於組成了一次“排队”。但是，無論采用“排队”办法也好，严刑拷打也好，变节分子进行挑撥也好，監獄长办公室仍

然无法使老共产党人屈服，无法迫使他們签署铁托分子为了毀坏上述这些人的名誉而迫切需要的悔过声明。

修正主义者給納粹分子的 刑罰加添了什么新东西

第一种刑罰就是“排队”，所有的共产党員都无例外地必須从这里走过去。在“排队”时如果所有的犯人都积极参加毒打难友的話，恐怕誰也活不了命。毫無疑問，“排队”是铁托分子新发明的同共产党員作斗争的方法。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新发明。他們的暴虐成性的想像力还发明了另外一些新花样。

第二种刑罰就是所謂“站圈”，这种方法的殘酷程度并不亚于“排队”。这是專門在“P—101”監獄里用来作为对于“排队”的一种补充的方法。“站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們簡單談一下。

特务把犯人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圓圈，起初是唱歌，然后就把受害者推到圓圈的中間，把他打得失去知觉。在“P—101”監獄里，每天都有几个犯人（关于这些人，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了，他們当中的多数人都参加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在西班牙打过仗）被打得半死不活。“站圈”是一种刑罰，也无異是私刑杀害。“站圈”时獄警經常在場監視“圈”內的行动。有一次，从貝尔格莱德来了一大帮国家保安局的高級官員，要檢驗各种刑罰的效果，他們都站在牆边观看共产党人“站圈”。这一帮人之中有兰科維奇的副手之一伏約·比拉諾維奇，不久前担任南斯拉夫駐加拿大領事的契累·科瓦切維奇等人。同他們一起的还有哥里·奧托克集中營主任的助手布兰科·达米揚諾維奇。

第三种刑罰是利用特务逼供。这也是铁托和兰科維奇賦有“特殊性”的发明，它不仅用在“P—101”監獄中，而且用在一切关有

共产党人的監獄和集中營里。在“P—101”監獄，特務在深夜把那些被稱為“頑固分子”的老共產黨員叫起來，帶到廚房里，在那里把他們毒打和折磨好幾個小時。“頑固分子”面前只有兩條道路：要不就答應國家保安人員向他們提出的要求，要不就死在他們手里。

被拷打的共產黨人的叫喊和呻吟聲，傳到其他犯人的耳鼓，他們懷着十分同情的心情傾聽着自己的難友在受嚴刑拷打。那些經歷過這種恐怖之夜的人說，傾聽難友們號叫，比親自經受種種毒打還要痛苦得多。實際上，這已經不是什麼刑罰，而是對共產黨人的慢性殘殺，拉布德·庫索瓦茨醫生就在受這種刑罰時被打破了耳膜，臉也完全變了樣子。

第四種刑罰是體力勞動。這是在所有的集中營以及在“P—101”監獄中都採用的方法。不同之處只是：在“P—101”監獄，這種方法實行得稍微晚一點，就是說，當監獄管理處已經在老共產黨人當中安插了大批特務之後才實行這種方法。甚至那些多年從事過最重的體力勞動的人也不相信，連勞動也可以變成最野蠻的刑罰。犯人們被強迫起初把石頭搬到一個地方，然後又搬回原處。這就不禁使人想起關於西集弗的古老的傳說，這個傳說又在鐵托的集中營里重復着（西集弗是一個神話里面的人物，他被神懲罰去不斷地把石頭搬到山上，然後又扔下來）。在“P—101”集中營里，犯人們曾凿了好幾個月石頭來作紀念碑之用。當時南斯拉夫不斷地遷移和掩埋在民族解放戰爭時期犧牲的戰士們的屍體，所以需要大量的這種石塊。然而，鐵托是多麼卑鄙無恥地侮辱南斯拉夫人民的高貴的感情啊！世界上只有那些作盡壞事的人，他們的行為才可以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相比擬，這些修正主義者一方面給犧牲的戰士樹立紀念碑，另一方面卻又拷打和殘殺那些戰士們的同志。犯人們心滿意足地作石塊加工的工作，因為在他們的那種艱苦生活條件下，這就算是“輕微勞動”了。不過在他們服刑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們總是日復一日地搬運石頭，凿開山崖，修采石場，用一塊石頭砸開另一塊石頭。這種情況就形成一種額外的懲罰，

铁托分子力图借此表明，这里的事情完全不在乎劳动，而在于把劳动当作刑罰。

犯人被分成三类：积极分子、 消极分子和匪徒

国家保安局把犯人分成三类：积极分子、消极分子和匪徒。最初，所謂“积极分子”只是那些在严刑拷打下已变成国家保安局特务的原来的党员。后来，在1952年，在“P-101”監獄內开始把那些在表面上签署了声明，說他們已經悔过并且同意铁托的政策的人也算在积极分子之內。哥里·奥托克集中营管理处之所以把这些人列为积极分子，是企图分化老共产党人的坚强集体，并且夸大自己“改造”犯人的成績，因为上級机关是根据积极分子数目来衡量管理处的工作的。国家保安局除了在集中营內要利用上述这些犯人帮忙之外，在他們出獄以后还要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国家保安局力图破坏老共产党人的名譽，因为，由上面可以看出，本来只有在集中营里的为国家保安局工作的人才得到“积极分子”的称号。这一类犯人拥有很大的特权。他們作比較輕的活，在厨房里工作等等。在分发食物时他們得到最好的一份。由于食物比較好，体力劳动比較輕，睡眠正常以及其他的特权，所以积极分子的特点是健康状况很好，而那些“匪徒”即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則一天天消瘦下去，簡直不像个人样子。所謂“消极分子”，就是那些无疑是經過毒打之后应付过了审讯的犯人，他們表面上声明說他們改变了立場，但是他們不願意在各种“改造”形式下面都表現积极。他們常受到特务施加的压力：要他們积极起来、同“匪徒”断絕关系，同国家保安局的活動分子合作。这些犯人中的多数都是忍受不住严刑拷打的人，因为在哥里·奥托克，凡是繼續忠于馬克思列

宁主义的人都遭受过严刑拷打。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也是作稍微輕一點兒的活，他們所處的条件，又比被称作“頑固分子”的“匪徒”要好一些。

折磨“匪徒”的刑訊

哥里·奧托克管理处所謂的“匪徒”，就是那些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共产党人，對他們的審訊尚未結束。管束这一类共产党人的制度是非常严酷的。他們經常作最繁重的活，而且遭受种种严刑拷打。甚至体力劳动对于他們也是不折不扣的刑罰。他們常常受到抵制，在工作时經常有專門派遣的特务盯着，并且每一个犯人都不仅有权力、而且甚至是有义务打他們和迫害他們。所有集中营里的情况都是这样。發給他們运石头的抬架是特制的，它后面的把手长，而前面的把手短，这样一来，主要重量都压在“受抵制的分子”的身上，因為他們必須抬前面。他們被迫抬着石头在尖石子上面快跑。如果受害者的动作慢了，特务就把他們罵得狗血淋头，并且恶毒地抽打他們。在苦役期間，特务們一面对犯人施加这种刑罰，一面向犯人逼供，要求他們在国家保安局所把持的口供上面签字。差不多所有这类犯人的脚上、身上、手上都有許多創伤，使他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那是真正的戈耳戈法（耶穌被囚受苦的山名——譯者注）。經歷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西班牙內战的人，在旧南斯拉夫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監獄里遭受过迫害和拷打的人，在法西斯集中营里受过苦的人，以及在过去的各种环境里由于建树了英雄業績而著名的人——他們因为天天遭受严刑拷打、看到滿目的恐怖景象、而又不可能作点什么有益的事情来改变自己和其他难友的状况，所以往往不禁都像孩子般地哭泣。特务准确地执行国家保安局的命令，

殘酷无情地迫害他們。如果某一个特务表现出稍微有一點心軟，国家保安局就会对他进行最野蛮的懲罰。

犯人不穿衣服，餓着肚子在 雪天和雨天工作

由于活儿既繁重不堪又要做得快，所以連变节分子也支持不住，一天当中要实行輪換，而那些“受抵制的分子”則筋疲力尽也不得輪換。为了折磨他們，还发明了一些名叫“天鵝”、“海鷗”的要运250公斤石头的特殊抬架。四个犯人在根本站不住脚的悬崖絕壁上搬运这么大的重量。抬架的裝載情况是这样的，即全部重量都压在“受抵制的分子”的身上（抬架的結構及其裝載的重量前面已經說明了）。許多共产党人由于这种刑罰而变成了殘廢或者丧失了生命。例如一块从抬架上掉下来的石头砸碎了韦科斯拉夫·科洛姆巴里的一只脚，結果不得不把这条腿截除掉。这种情况在扎腊附近的烏格兰島上也发生过。在“P—101”監獄的采石場里，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个名叫佩科（佩特尔·菲利泡夫斯基）的馬其頓犯人死掉了。

冬天，“P—101”監獄和其他集中营里的犯人被强迫餓着肚子、脫了衣服在雨天、雪天和暴風雪中劳动。当局故意长时间内专门不給老共产党人发衣服，讓他們穿得破破烂烂。夏天，犯人們不仅由于过度繁重的劳动，而且由于酷热而痛苦不堪。另外一种刑罰就是渴。甚至犯人在用大桶运水的时候，特务也不讓他們喝水。如果他們之中有誰要水，特务总是說：“当你把案子搞清了、改变了自己的立場、并且把审訊人員所要求的東西都写出来了的时候，我們就让你喝个飽。但是在那时以前，当你沒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一滴水也不叫你喝。”

为了惩罚那些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还采用一种 12 公斤重的大锤子。这种锤子是用来在特务监视之下砸岩石的。铁托集团在折磨和侮辱犯人方面的创造力真是大得很。例如，在毕列奇集中营里，有些犯人的脖子上被系上缰绳，就这个样子被赶着出去工作。他们的头被戴上妇女用的披巾。一个特务拉着一个犯人的缰绳，另外一两个特务在后面打他，赶着走，以便快一点把一个很重的东西运到指定的地点。当犯人双手到处是伤，不能用手拿抬架时，别人就用绳子把抬架绑在他们的脖子上。如果犯人由于极度疲劳或受伤而摔倒了，或者讲了一句话，说再也干不下去了，在这种场合下，就采用另一种刑罚。这种刑罚是怎样的呢？

它叫做“加压力”。它的用法是这样的：把共产党员按伏在地上，背上压一块重达 100 公斤的石头。受害者身上由于承担了这样重的压力，喘不过气来，简直觉得每根骨头都要碎了，人好像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犯人凄惨地号叫、呼救，并且答应继续干活。特务把石头搬开之后，又驱使他去干活。“受抵抗的分子”由于惧怕再受这种人人之心惊肉跳的刑罚，就不顾死活把最后的一点气力也使出来继续干活。在这种条件下，往往每个“受抵抗的分子”都产生自杀的念头，而且许多人曾经企图自杀。不过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跟着的人和特务都盯得很紧。国家保安局的机关曾经发出过严厉的警告，说如果某个犯人在审讯结束以前自杀了，就要对其他犯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在“P—101”监狱，当“受抵抗的分子”无法再坚持干活时，当场就被叫去走过“队列”。这种情况下的“排队”，竟残酷狠毒到如此地步，例如，当人已被打得失去知觉而不知道是死是活以后，特务还要继续毒打。特务在犯人走过“队列”之后，还继续折磨他，然后放到担架上送到诊疗所去“治疗”，或者更简单地說，送去继续受刑罚。尽管有上述这许多惨象，而兰科维奇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却把所谓“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說成是这样的，“实际上也就是設法給他們（指被监禁的共产党员——譯者注）以机会，使他們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他們自己

的劳动、努力和行为来認識他們的錯誤和参加我国各族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根据这些非常合乎人情和人道的原則，仅仅处罚他們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劳动。”

多么“合乎人情的”和极其“人道的”原則呀！如果說恐怖的“排队”、“站圈”、累死人的毫无益处的西集弗式的劳动、燒紅的铁、或者口渴和飢餓的折磨等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非常合乎人情和人道的原則”的話，那末，劊子手、掌刑人和罪恶的暴徒就都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人道的人，而且他們之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当然就是南斯拉夫所有地獄般的集中營的积极建立者和組織者亚历山大·兰科維奇本人了。

然而上面列举的这一大堆刑罰并不只是如此而已。铁托分子对共产党人还使用其他許多刑罰。既有肉体的刑罰，也有精神的刑罰，后者同前者一样殘酷，在精神刑罰的折磨之下，人的內心深处的感情、他的尊严、他的人格都受到极大的污辱。还有一种同样极其殘忍的刑罰，这也是铁托的“人道主义者”的最“合乎人性”的新創造，就是給什么人施刑，是有选择的：所选择的都是那些曾經为反对占領者和烏斯塔什匪徒而英勇斗争的人，铁托分子毫无良心地把他們赶入集中營里，在那里对这些忠誠的爱国者施行种种刑罰。这一方面是最大的諷刺和卑鄙无耻，另一方面也是說明铁托政权真相的最好的铁证。例如，1956年，哥里·奧托克監獄管理处甚至起用那些罪恶滔天的罪犯分子来給“受抵制的分子”施刑。在旧格腊迪什卡監獄，巴韦利奇手下的前法西斯分子和烏斯塔什分子都被任命为“改造”共产党人的牢房看管人。有一个叫做“懶鬼”的杀人不眨眼的战犯斯捷方·尼科里奇当上了牢房看管人，他殘酷地拷打共产党人。他随身帶着刀子，威胁着犯人說要割断他們的喉嚨。他亲手打断了拉多·拉維捷夫以及其他許多共产党人的肋骨。

还要受许许多多刑罚

“P—101”监狱对付犯人的第五种刑罚就是所谓“敲脑袋”、“罚站和不让睡觉”。“受抵制的分子”刚刚吃完食物既少且坏的午饭或晚饭之后，在劳累了一整天之后，又被强迫着去把石头砸成碎块，而且不准用铁锤，只准用大石头砸。有时还强迫他们立正站着，他们常常站到半夜或从半夜站到早晨。惩罚许多“受抵制的分子”的另一种方法是连续几夜之内不让睡觉。

当“受抵制的分子”在砸碎石头的时候，特务就四面包围着他们，唱着侮辱人的歌子，敲他们的头，但不是用拳头，而是用手指头的关节敲。“受抵制的分子”在受这种刑罚的时候仍然要不停地劳动。由于受这种刑罚，犯人往往完全失去知觉，结果穆斯塔法·特尔波尼亚的眼睛都肿得不像样了。施用这种刑罚的结果，首先使人的神经系统受到破坏。

第六种刑罚就是饥饿和渴刑。饥饿、口渴、干累死人的活、殴打以及其他许多刑罚，严重地毁坏了犯人的健康。1952年，不仅在“P—101”监狱，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都有犯人大批死亡的威胁。被监禁的一个医生科学地证明了这种情况。它引起了兰科维奇的惶恐，他亲自去参观了哥里·奥托克的“P—101”监狱。他在那里所看到的不是人，而简直是一些骷髅，不过他沒有同任何人谈过话。他来过之后，为了避免这种世界丑闻，食物稍微改善了一点，但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受抵制的分子”干的）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刑罚仍然照样实行。兰科维奇的来到还带来了一种新的刑罚，对“受抵制的分子”“排队吐唾沫”。

对那些不愿当变节分子 的犯人实行抵制

抵制分轻重两种。对已经判罪的犯人采取这种决定是由集中营管理处确定的，而在实行抵制时，却给新犯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犯人们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国家保安局机关的命令搞的。

“受抵制的分子”遭到骇人听闻的压迫，首先是精神上受到种种侮辱，其次是要做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不准睡觉、挨打等等。他们没有丝毫权利，得不到任何保护，因为集中营管理处在建立集中营的时候就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写着“对于敌人没有法律”的标语牌。“受抵制的分子”穿的是上了颜色的特殊衣服，人们从远处就可以分辨出来。他们时时刻刻，甚至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也要劳动。他们必须保持沉默，不得与任何人谈话。如果谁想张嘴哪怕自言自语说点什么，就要受到残酷毒打。每天在劳动之后，或者在晚饭后，他们都要走过自己牢房前面的“队列”。这种“队列”同前面说过的相类似，不过稍微轻一点。有时在晚间搞“排队”。在更糟的情况下，是在星期天搞全集中营的“排队”，有几千犯人参加。“排队”的讯号使犯人心惊肉跳，因为结果总是有人被活活打死。这种“排队”首先是用来对付那些企图逃跑或拒绝劳动的犯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打骂和侮辱“受抵制的分子”，向他们吐唾沫。这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且是那些背叛了信仰的人应尽的义务。谁不这样做，谁就被认为是消极分子，也要遭到抵制。”实行抵制的時間起码一个月，长的竟达到十个月，几乎每个已判刑的犯人都要受到这种惩罚，而那些实行反抗的犯人则往往被抵制四五次。当牢房看管人的变节分子拥有最大的特权。他们不劳动，

穿軍官制服，發給他們的烟酒也不限制數量，還可以沿河岸散步。總之，他們有很多優越條件。國家保安局人員要求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折磨、毒打甚至殺害犯人。國家保安局人員卻裝模作樣，似乎他們並不知道集中營內所發生的事情，而犯人相互之間發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犯人的私事。那些信仰堅定的共產黨人力圖向其他犯人說明，國家保安局玩弄種種陰謀詭計，在犯人當中安插特務從而造成種種罪行。不言而喻，這些共產黨人的處境是多麼困難。這一切都是萬分困難的，因為犯人相互接觸幾乎根本不可能。那些信仰堅定的共產黨人一般都受到了抵制，因此他們不能開展什麼工作。

犯人在判刑后被关进集中营， 但他的案子到此并没有结束

必須指出，犯人在判刑后關進集中營，但他的案子到此並沒有結束。實際上審訊正是在集中營開始的，而且一直要進行到犯人獲釋時為止。經常有某種新問題提到案情中來，如果犯人沒有什麼口供補充，他必須挖空心思去想。犯人常常要把他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以及親友等說過的話詳細地寫出來。當犯人們知道，國家保安局會採用什麼樣的殘酷手段來對付作為“共產國際情報局分子”而抓來的人時，對於他們審訊就是非常可怕的事。審訊人員在審問時，不僅使用直接的肉體刑罰，而且還用其他手段：欺騙和挑撥。他們使受害者經常處於恐怖之中，弄得他失常，強迫他招出自己的全部親友。有很多犯人曾經企圖自殺，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無法再經受這種拷問，最後不免要被迫招出自己的親友，而構成國家保安局逮捕他們的罪名。

按照國家保安局的規定，每個犯人關進集中營以後，在兩或四

个月之内必须在一次法定人数的犯人参加的会上说出自己的政治信仰。犯人发言以前，被关在临时监狱里，在这里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进行挑拨和折磨。但是，犯人在囚房里，仍旧没有机会同能够教他如何行动的犯人们交谈。监狱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个犯人在全部监禁期间，总是有特务盯着，他们不但折磨和迫害他，而且千方百计地劝他必须反省自己的行为，强迫他在其他犯人面前说话，而且要把受审时所要求他讲的一切都说出来。他必须把自己说成一个最坏的人。犯人在谈自己的行为时，必须保持这样的姿态：低着头，把双手放在背后。如果他不这样做，一群特务就会向他猛扑过来，痛打一阵。犯人必须详细说明自己从生下来直到共产国际情报局发表决议（这是自传最重要部分）时止的情况，接着从发表决议日起说到被捕时为止，最后从被捕起说到讲明自己的政治信仰时为止。犯人在发言讲到自己的行为时，自然会表现惊慌和胆怯；他觉得听众都是厌恶他的。他低垂着头，弄不清谁在骂他，谁在打他。有些犯人面对着各种严刑拷问，由于怕死，就被迫招认说，似乎在苏联学习时，在那里当过间谍，在战争时期做过纳粹秘密警察局或者意大利特务机关的特务，或者承认自己是怕死鬼和逃兵，等等。也有这样一些犯人，他们由于害怕而承认，似乎他们曾经同时当六、七个外国特务机关的间谍。如果谁后来想否认这种自我诬蔑的捏造，谁就会大倒其霉。例如，斯罗波丹·波伊奇是斯勒姆的一个农民，他被迫伪供战时做过纳粹秘密警察局特务，而且由于他的罪过有55个同村老乡遭到枪杀。但后来波伊奇声明，上述伪供原来是审问人员逼出来的，结果他便被活活打死了。

国家保安局还要求犯人，特别是要求那些著名的党员和已婚男子，说出与哪些妇女发生过关系的各种材料。这种消息的用处在于破坏犯人的名誉，并渲染说：“瞧！拥护共产国际情报局决议的就是他们这伙人。”犯人自我诽谤和诬蔑得愈厉害，他挨打就愈少，并且被认为具有“改过自新”和“重新作人”的表现。特务经常盘问犯人一些事情，使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特务又大吼起来：

“打倒匪徒，抵制匪徒！”

审問人員的任务是 尽可能多地培养特务

犯人是否改变了政治信仰，不是根据体力劳动来判断的。犯人們常常被要求表现“积极性”和“参加反对敌人的斗争”，即反对共产党人。书面声明和口头声明被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审問人員根据这些材料提出决定意見，把他們对每个犯人所采取的措施报告上級机关。他們对这种事情非常重視，因为他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犯人的精神崩溃以后，从其中尽量培养大批的特务。

这里必須指出，国家保安局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别是初期，在新来犯人和某些老犯人当中。国家保安局全力在犯人中間造成互相猜疑的气氛：似乎一个人要相信另一个人，必須花費很多時間。某些犯人甚至对自己也丧失了信心，认为自己无力反抗。全部“改造”机关都必須使每个犯人产生一种孤立的和孤独的感觉。国家保安局千方百計使犯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的全部难友都在反对他。一个犯人是否反对那些在監獄中坚决进行反抗的民族解放战争领导人，是否反对 1941 年的游击队員，特别是是否反对战前的共产党員，这是一种衡量他改造程度的标准。国家保安局經常迫使犯人走上这条道路，用一切手段强迫他們反对那些繼續反抗的人，以便后来清除这些人的影响。

有些在意志和思想上比較脆弱的犯人漸漸参加特务机关的工作，結果成了叛徒。这些叛徒为自己的行为辯解，說什么只有这样作才是脫离監獄的唯一机会。这样一条道路，如果他們一直走下去，当然，一定会导致犯罪活动。国家保安局在达到目的以后，常把这样一些人放出監獄，并且利用这种釋放来达到它們的宣傳目

的。这些人出獄以后，又被吸收去干監視活动和特务勾当。此外，他們还被派到犯人会上去作“自我反省”，說什么他們自己曾經被卑鄙的动机所驅使，走上了叛变道路，“拥护过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決議”，而現在在政府帮助之下，他們才得到了“改造”。

納粹秘密警察局集中营的經驗

国家保安机关的軍官和审問人員利用达卡烏、布肯瓦里德和阿烏斯維茨等集中营里納粹秘密警察的經驗，大力建立了各种特务組織，然后通过它們去招募其他人員。招募工作在犯人被轉押到集中营去以前要拘禁一个时期的临时監獄里就已經开始。每一个新犯人都迫切盼望能够进入集中营，因为他們认为，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老共产党员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坚定的战士。国家保安局很了解这一点，因此，在1951年就建立了一所临时監獄，在那里，任何一个犯人都不敢和其他犯人保持联系。与新犯人同来临时監獄的还有許多最有經驗的特务。他們的作用是各种各样的：一部分特务是专门打人、搞迫害活动和强迫犯人在审讯記錄上签字，另一部分特务則专干欺騙勾当，装得儼然如新到犯人一样。他們被責成去公开煽起反对“改造”的抵抗活动，爭取新到犯人的信任，并用一切办法接近这些犯人。为了實現这种詭計，这批特务也同其他犯人一样，遭到迫害和拷打。他們在取得新来犯人的信任以后，便告訴这些犯人說，集中营里有秘密党組織，并且說出这些新犯人在被捕前曾听說过的某些人的名字，例如，他們說，所有这些沒有出卖共产主义荣誉的党员都加入了这个秘密組織。如果新犯人中了这个詭計，就必須具結，保证至死也不把組織出卖給任何人。然后，这些特务便要新犯人每人都把自己在被捕前的共产主义活动、同其他人談过一些什么話，通告訴他們，并介紹他們

与志同道合的人通信，而这些信件“組織”可以很容易地設法送出監獄去。这些特务在离开临时監獄以后，同他們繼續保持联系，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以前被監禁过的共产党员与新犯人发生了接触，并且把集中营内的真实情况告訴了他时为止。但是，現在已經迟了：現在他已經陷入了国家保安局的罗网了。

国家保安局想尽一切办法，在犯人当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背叛信仰、与铁托的全部政策妥协和充当特务的道路，另一条是繼續搞工人运动的道路，这就意味着終身監禁。国家保安机关为了使犯人了解沒有其他道路可走，曾一再將試图逃跑的犯人当众活活弄死。在弄死以前，狠狠拷打，目的是要了解，誰曾帮助他准备逃跑，然后用繩套着脖子把他牵出去，当着所有排着队的犯人活活打死。在战时当过紅軍軍官的弗拉斯契米尔·彼得洛維奇，就是因試图从圣格里哥里耶島集中营逃跑而被这样活活打死的。国家保安机关常用每个犯人的死亡来影响其他犯人的心理状态。而在集中营里每天都死人，因为极端殘酷的痛苦、飢餓、干渴和沉重的体力劳动促使各种傳染病的流行。

犯人怎样受侮辱

国家保安机关特別好使用侮辱手段，凡是触犯人的尊严的办法，它們都加以采用。这些办法首先是用来对付老共产党员的，因为对于他們，保安人員力图借以强迫他們背叛自己立場的其他一切办法都不起作用。侮辱人的审讯从被捕的最初日子起一直繼續到釋放出獄为止。国家保安局知道，为了摧毁一个人，首先要根除他身上存在的人的感情和共产主义的感情，于是采用最駭人听闻的侮辱方式。甚至許多无法說出口的最下流的罵人話和向臉上吐痰的办法，在这里都成了家常便飯。保安人員用最下流的話辱罵

犯人的母亲、妻子和姊妹。但是，在他們的侮辱办法的武庫里，远不止于这些东西。在旧格腊迪什卡監獄里，他們常把判刑的軍官头朝下倒吊起来。他們每天晚上都举行斗士游戏，强迫“受抵制的犯人”互相毆打，一直打到失去知觉为止。他們对拒絕参加游戏的人，便用最殘酷的办法来加以懲罰，例如，用紙烟燻他們的鼻子，用水灌鼻子，强迫他們做狗叫，互相当馬騎。

有一位馬利揚·莫施科維奇，是游击队的老战士和指揮員，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妻子都在戰爭中牺牲了，他被迫在脖子上套着貼有写着下流話的紙条的狗鎖鏈，在新犯人面前奔跑并且做狗叫。彼得·米奧得拉戈維奇，也是老战士和1941年时的部队指揮員，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总委员会的人民代表，他竟被迫光着身子，手拿圣像，当着犯人在室內爬行。米兰·阿布腊莫維奇是上校师长，荣获过英雄称号，特务們在他背后系上一条牛尾巴，他在集中营內干活时必须带着。薩沃·斯塔諾也維奇是一位上校、人民英雄，战时最著名的勇士之一，特务們却用侮辱和折磨办法，强迫他在同室的犯人面前哭泣。斯塔諾也維奇受了这种侮辱以后，曾企图自杀，結果終身变成了殘廢。为了尽量侮辱共产党员，在毕列奇組織了一个所謂“出售腐爛物”的企业。在这个“企业”里工作的犯人必須泡在粪坑里。然后，特务把他們从那里撈上来，叫其他犯人看他們被弄成了什么样子。生长在策腊的六十岁的久科·米腊舍維奇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荣获过矿工英雄和卡伊馬克卡兰英雄的称号，在旧南斯拉夫軍隊里得的勳章最多，他被强迫学做狗叫，最后被宣布为三个外国特务机关的特务。特务們为了更加恶毒地侮辱这个善良的人，竟强迫他赶两头毛馱，去运各种髒东西。切特尼克們还給其他許多犯人粘上土匪的鬍鬚，頸上挂起写着下流話的紙片，强制他們在所有犯人面前，說自己是撒謊者，等等。

国家保安局除了上述办法以外，还采用一种心理拷問办法。铁托分子知道，如果不首先从思想上使共产党员屈服，要强迫他們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他們想尽一切办法

来铲除他们对苏联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心。他们强迫过去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呆过的犯人，尽量以书面的和口头的形式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诬蔑。如果谁不同意这样做，谁就会被宣布为苏联的间谍，遭到不断的拷问。这种“政治学习时间”常常安排在晚上下工以后，那时候犯人已经很疲倦，连对他们说些什么话都听不清楚。如果保安人员发现有人打盹，或者不能回答提出的问题，就实行毒打。同样，不愿发言和不愿诬蔑苏联的犯人，都要受到抵制和迫害。

犯人对集中营里的各项措施，都必须认为是必要的措施，是使他们能够回到人民当中去的唯一机会。他们在通过“排队”的时候，必须用好话赞美铁托政权说：“所有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必要的。瞧！这对我们多么人道啊！如果我们是在别的国家，准会因叛变罪而遭到枪杀。”这些不幸的受难者在做完一件沉重的体力劳动以后，又必须按照国家保安局的教导，赞扬今后将要作的事情说：“你看！党对我们多么关心！它给我们劳动的机会，要是关在某间班房里，真会闷死人”。任何犯人都敢直接用集中营这个名词，而只敢叫做“劳动场所”。谁也不敢说：累了、饿了、口渴了，或者说集中营的生活很苦。他们必须把受抵制的人叫作下等人、懦夫、强盗和骗子。谁如果胆敢说那些犯人中某人哪怕一句好话，他就会被当作敌人受到惩办。

“P—101”特种集中营或死亡坑

亲爱的读者！你们已经知道在哥里·奥托克有一个“P—101”监狱——集中营的监狱，或者说，十八层地狱。你们一定痛苦地耽心你们牢记在心里的那些老共产党员所受的折磨，虽然，我们仅就他们一生中众所周知的事情说了三言两语；你们不仅知道了各个

監獄里挨打、受苦和遭受殺害的人們的詳細名單，而且了解了那些妄想把自己打扮成“人道主義者”的人們所精心製造的各種刑罰名稱；你們已經相信，這些“人道主義者”的目的不是別的，而是要消滅大批大批的人的理想，當他們達不到這個目的時，就砍去那些人的頭，以便消滅思想，強迫人們投降，迫使人們走上叛變和犯罪的絕路。你們已經看到，他們對被關進十八層地獄即“P—101”特種監獄的犯人，使用了最殘酷的刑罰、最卑鄙的和最侮辱人的手段。我們曾考慮了很久；在這本小書中還要不要專用一章寫“P—101”特種監獄，因為以前我們已經說了很多關於它的情況，而且我們已經情不自禁地重複過一些我們早已說過的事情。然而我們還是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我們不把“P—101”監獄專寫一章，我們就無法說明鐵托式的集中營和監獄的本質，如前所說，這些集中營和監獄可以說最能表明南斯拉夫“特殊的社會主義”本質。儘管我們不想重複，但某些說過的事情仍然不得不重複。親愛的讀者，當你們讀到這本小書的時候，你們讀到共產黨員同志們是怎樣慘遭殺害的時候，你們好好想像一下在那暗無天日的十八層地獄里極其殘酷地首先是對共產黨員實行的一連串的嚴刑拷打、侮辱和挑撥吧。當你們讀到奧茲蘭是怎樣被殺害的時候，請不要忘記，還有1000多名共產黨員都是這樣慘遭屠殺的。還請你們想像一下那一連串的拷打、侮辱以及其他刑罰；請你們特別注意，這一切都發生在“P—101”監獄，然後你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雖然是模糊的、但卻是比較全面的印象；即什麼是犯人如實稱呼的所謂死亡坑。但是，請別忘記，被投入其他監獄和集中營里的還有三萬個左右的共產黨員，他們也受過這樣許多刑罰的折磨。

我們已經說過，還在共產國際情報局決議公布以前，鐵托起初是堅決反對黨的老幹部。他幾乎把他們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以前曾在蘇聯呆過的幹部，撤離了機要的崗位。這裡必須補充一句：鐵托從一領導黨起，就開始清除最忠誠的黨員。與此同時，他拉攏了許多阿諛奉承、鑽營名位的人和其他嫌疑分子，因此，前南斯拉

夫共产党领导的瓦解过程不应当从 1948 年算起，而是在很早以前……赫布朗格和朱約維奇并不是铁托的头批牺牲品。

铁托决心肆无忌惮地逮捕一切老共产党员，因为他深知，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定会反对他那种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政策。我們也已經看到，上述許多共产党员都被送进了哥里·奥托克——恐怖和死亡集中营。

国家保安局在集中营的斗争过程中看清楚了，老共产党员实行反抗的比其他犯人更多，而他們本人的榜样又影响其他犯人。因此，为了更快地便于从意志上和思想上使共产党员屈服，在哥里·奥托克設立了一个“P—101”特种集中营，主要是把那些反抗所謂“改造”政策的比較著名的老共产党员送进去。在 1951 年初，还把一批无法屈服和分化的军官从旧格腊迪什卡监狱轉送到了圣格里哥里耶島。这批军官中的一部分反抗最激烈的人被押送到了“P—101”。国家保安局认为，把这些军官分开，才便于制服其他军官，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实现它那罪恶的“改造”计划。

在“P—101”有一个深度和直径各約 10 米的大坑。坑里盖了一个不大的牢房和一間厨房。坑的四周筑起了一道高达 3 米的圍牆，牆上有哨兵站崗。在这个坑里关了 117 个犯人，其中有一部分是精选过的特务。在这里，犯人的处境比在其他集中营里更加孤立得多。甚至連国家保安局的军官和島上的警察也不敢走近大坑。犯人在坑里被迫互相毆打，彼此折磨，目的是要挑起仇恨，从而使他們断絕来往。“P—101”由野兽般的制度統治着。犯人痛苦地眼看着特务們常常用最殘酷的手段毒打、侮辱和折磨很年老的人和老共产党员。国家保安局在使用第一批特务无效以后，便派进一些新特务到“P—101”去，并且对犯人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即使用尽这些伎俩仍然无法使大多数老共产党员屈服。

共产党员的处境多么痛苦，他們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从下列所写的几件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

根据铁托的命令（为了报复），奥兹兰遭到严刑拷打并且被杀害了。特务每天拷打他。当时全体犯人都知道，特务力图尽快杀害奥兹兰。他同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在1949—1950年就处在生死关头。在那个时期，铁托和他的同谋者特别妄想要老共产党员提出“悔过声明”。

当犯人们拒绝提出这类声明时，当局就大大恶化了本来就很残酷的监狱制度。前联邦政府的部长沙瓦·兹拉奇茨和切尔诺哥尔斯克政府的部长尼科·巴维奇就是被这些困难条件所压服的。他们的声明后来曾经发表在《战斗报》上。但是，在老共产党员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悔过声明”，也没有人像兹拉奇茨和巴维奇那样做，因此，监狱管理处吸收大批特务，把他们派到“P—101”监狱去干折磨老共产党员的勾当。因此，监狱成了真正的地狱。奥兹兰就成了这批特务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个身体健康、意志坚强的人，他能够经受最残酷的拷问。警察中士科斯罗维奇不止一次地注意监视，看特务们怎样拷问奥兹兰，有一次，当他认为特务们没有很好执行任务时，这个刽子手就亲自把奥兹兰叫到管理处去，在那里极端野蛮地毒打他，这个不幸的人就这样忍受不住毒打而去世了。当犯人们把死者尸体抬走的时候，科斯罗维奇向大家喝道：“快把这骯髒的东西弄出去。要知道，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莫斯科的一切特务。”据南斯拉夫流亡者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奥兹兰是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铁托恨他，是从他们两人同在莫斯科的时候开始的，而当奥兹兰在1946年刚回到南斯拉夫的时候，铁托便想向他报仇。他很快被关进了监狱，但铁托要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并加以杀害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决议公布

以后，形势改变了，铁托就趁机用最残酷手段来消灭这位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保安局把对奥兹兰的杀害，照例说成是自然的死亡，但他本人在死前对同志们说过：“同志们，我是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如果你们之中谁能活下来，请告诉我的妻子，他们是怎样杀害我的。你们决不要投降，宁作英雄而死，决不屈辱偷生。”

哥里·奥托克集中营的其他监狱也使用惨绝人寰的恐怖手段，来消灭信仰最坚定的共产党员的肉体。瑞基奇将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年期内的深夜审讯

瑞基奇将军在战前就是过去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旧南斯拉夫的皇家警察局曾拷问过他，但他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定。在臭名远扬的贝尔格莱德监狱里，警察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时候党内同志都赞扬瑞基奇，说他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精神财富。他在战争时期在霍尔瓦茨卡担任过总参谋部的主任，战争结束后，他是南共中央委员和霍尔瓦茨卡政府的工业部长。起初，他对铁托的领导抱有幻想，但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看清了铁托在把南斯拉夫领到那里去。他在1950年同波什科·布尔基奇、恰尼查·奥巴齐奇等两位部长一起，公开反对铁托和兰科维奇的政策。在这个时期，他的立场对铁托集团是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与上面两位部长一起立即遭到逮捕。铁托分子把拉德·瑞基奇几乎单独监禁了两年之久，因为他们无法使他屈服，同时他们又不敢把他送到哥里·奥托克集中营去，因为那里由于犯人发生分化而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铁托分子认为，如果他在那个监狱，这对他们是一种很严重的危险。拉德·瑞基奇的这种伟大精神力量，能够使国家保安局以往在整顿“改造”办法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

归于无效。只是在监狱制度得到某些巩固以后，拉德·瑞基奇、波什科·布尔基奇和恰尼查·奥巴齐奇才被送到哥里·奥托克。

1952年2月，对瑞基奇实行了一套专门的办法。哥里·奥托克集中营的其他犯人通常都要在犯人面前谈自己的政治信仰，但他不这样做，这倒不是由于他不愿意表明自己，而是为了免得惹起国家保安机关对他的怀疑，因为它们害怕他可能说出某种不利于它们的事情。因此，特务们常常对他实行抵制，除了监狱长以外不准他同任何人谈话。起初，特务们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他屈服，把他关进采用特殊审讯方法的地牢。但在经受了三个月的审讯以后，他又被送回牢房。监狱长派了一个伪装犯人的特务盯着他，监视他的行动，看他做些什么。以后，他便受到一种长时拷问方法的折磨。在一年当中，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对他实行拷打。但是，拉德·瑞基奇没有屈服，他甚至一句话都不说。他处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便决定宣布绝食，一直继续到连半分气力也没有了。许多与绝食者打过交道的医生都说，瑞基奇是个奇人。他在47天内没有吃一点东西。于是他被送进医院，强行注射营养剂。后来，哥里·奥托克管理处对他采用了另一种办法。他在医院里被押进另一个已经改成为铁格子牢房的房间。食物从门上一个小洞口送进去。水门汀地上铺了一些稻草，总共才给一条被子。跟我们谈话的人都说，拉德·瑞基奇活着时再也没有出来过，只是死了以后才离开这间牢房。看守牢房入口的警察，甚至不准他出来上厕所。

妄想使拉德·瑞基奇屈服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在1954年3月进行的，跟我们谈话的人说，这正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斯维齐斯拉夫·斯捷凡诺维奇亲自来对付他的时候。特务对他讲，斯捷凡诺维奇部长和哥里·奥托克监狱长韦谢林·布拉托维奇想跟他谈话，他拒绝谈话，回答说：“我同这种罪恶分子没有什么可谈的。”大概，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话。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英雄拉德·瑞基奇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54年3

月，当一批軍官犯人被押到哥里·奥托克的时候，听说拉德·瑞基奇还活在那间可怕的单身囚室里。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大概国家保安机关这时已经把他杀害了。送给他妻子的死亡通知（虽然兰科维奇的警察很少这样做）证实了这种推测。铁托及其同谋者也极力把瑞基奇的死说成是一种自然死亡。尽管拉德·瑞基奇和波什科·布尔基奇关进监狱比其他人都晚得多，但他们在此以前，对南斯拉夫各集中营和监狱里究竟受着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的统治，甚至是一无所知的，虽然他们两人都是南共中央委员。

当南斯拉夫流亡者谈到拉德·瑞基奇、奥兹兰和其他难友的牺牲时，他们的声音低沉，脸色悲哀。显然，这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同志而感到深深悲痛的反映。这里必须补充一下，这全部叙述都充满了担心自己同志的命运的痛苦，充满了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命运的忧虑，因为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他们曾经在皇家监狱里，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在铁托和兰科维奇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却洒过无数的鲜血，饱尝过无数的苦难。他们在专门叙述拉德·瑞基奇和奥兹兰被杀害情况时，声音常常很高，同时带着失望的语调，从他们脸上，流露出一种为两位受难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到自豪的表情，因为这两位党员保持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对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抛出了无限蔑视的眼光。虽然，南斯拉夫流亡者对我们还讲了其他一些惨遭杀害和受折磨的共产党员的情况，还说了许多其他事情，但关于这点我们打算只讲到这里为止，另外，想讲一下集中营生活中的一些其他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也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政权极为黑暗的方面。

要想出监狱，必须烧毁一切桥梁

按照铁托和兰科维奇的說法，犯人要想出獄，必須“燒毀”連結

他和共产主义的“一切桥梁”。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达到下述条件：

表明犯人改过从新的第一个标志是打消一切顾虑。这就是说，他必须出卖那些尚未暴露的和反对铁托的共产党员。某些犯人由于经受不住审讯时的严刑拷打，便诬告那些根本无罪而随后被捕入狱的人。因此，同共产党情报局决议毫无关系的南共党员也大批被捕入狱。这样被捕入狱的有几千人。还有几万人是准备加以逮捕的。监狱中塞满了共产党员。后来，国家保安机关考虑到如果继续这样做，他们就不得不逮捕成千上万的南盟盟员，于是才停止了那种仅仅根据囚禁在集中营和监狱中的过去的党员受严刑拷打时逼供出的材料而进行的逮捕。然而那些招假口供或在受审过程中乱咬无辜者的犯人却仍被国家保安局看成积极的犯人。但是这一切还不能算是“烧毁桥梁”。

审讯以后，犯人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监视和他一起囚禁在监狱或集中营内的自己的同志。根据同哥里·奥托克监狱管理处合作的犯人提供的材料，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遭到拷打。这种向监狱当局的告密，不仅采取口头方式，而且采取书面方式。国家保安局仔细地收藏着各种书面证据。这种事使受害者同铁托集团的命运有了新的联系，因为它使人变成了奸细。然而，犯人如果想成为“已烧毁一切桥梁”的人，这还不够。国家保安机关利用已堕落为奸细的犯人在其他犯人中进行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国家保安机关有一个详细拟定的计划。如上所述，这个计划由各种奸细分别完成，即一部分奸细充当用刑的刽子手，其余的则监视犯人。在大多数场合，奸细们都担任囚室室长、副室长、上等兵、队长等等。他们同国家保安机关一起，并且按照它们的指示在哥里·奥托克犯下了无数罪行。例如，他们在集中营杀害了南共科索沃—梅托希亚区委会委员、过去最老的党员之一奥梅尔·切尔凯兹和腊伊切维奇博士教授以及医生普雷梅尔里·安德里亚绍维奇等人。为了奖励杀害奥梅尔·切尔凯兹的行为，凶手得到释放。这里指的是

扎莫·切基奇，他是前国家保安局軍官，曾在哥里·奥托克当奸細。另一部分奸細的任务是采取相反的立場，即向犯人献殷勤，而不是拷問和折磨犯人，并且一般地对犯人保持最友好的态度。他們完成这项任务时必须不使人产生任何怀疑。許多犯人由于过去从未坐过牢，沒有同奸細作斗争的經驗，他們时常成了奸細們的牺牲品。某些犯人看到已經陷入罗网，便屈服了，自己也就成了奸細。不願当奸細的人則受到最殘酷的折磨。第三部分奸細直接在犯人之中培植，从形式上看，他們是犯人最坏的敌人。前上校莫姆契洛·帕累克西奇和中校維尔科·托米奇以及伊利亚·卡列維奇是搞这种特务工作的著名人物。帕累克西奇和卡列維奇出獄后仍然繼續他們的奸細密探工作。

犯人变成告密者以后，审讯人員就要他参加偵察其他犯人的案件，同样地也要他拷問和毒打他的同志。如果犯人动摇或者拒絕，他就会重新遭到拷打，并且被称作“投机分子”或“伪君子”。但是，即使他认真地干他的罪恶勾当，对哥里·奥托克管理处來說，这还不能证明犯人已經“燒毀一切桥梁”。

除去其他一切之外，当犯人学会了南斯拉夫报刊上經常发表的各种反苏的毀謗捏造时，才认为犯人的行为經過了充分可靠的考查。每天用来开导犯人的一切反苏材料所追求的目的是以仇恨苏联、苏軍和苏联共产党的精神对过去的南共黨員进行“思想改造”。所謂“老练的”和“受抵制的”犯人无权閱讀任何书籍，整年看不到一份报纸。国家保安机关认为，犯人如果什么也不讀，很快便会投降。此外，“經過审查的犯人”在哥里·奥托克期間必須每天在其他犯人面前公开反复地說，“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蜕化了”，“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受到的剝削比任何資本主义国家都更重”，“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想奴役各个大小民族，其中包括南斯拉夫”。

許多犯人必須写悔过书，在报刊上公布，以此证明自己“改造好了”。

在离开監獄或集中營之前，許多經過審查的犯人必須具結保證釋放後為國家保安局服務。如果受害者出獄後確實繼續從事密探特務活動，這時，國家保安機關才認為他們是“改造好的”犯人，並且分配工作。然而，真正死心塌地地準備跟隨鐵托和蘭科維奇的“改造好的”犯人是比較少的。國家保安局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對大多數“改造好的”犯人仍然特別警惕，而且往往不給他們任何好工作、任何適合他們專長的工作。現在，他們已經成為哪里都不合適的無用的人。

对被監禁共產黨人家屬的迫害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早已變成一伙政治罪犯匪幫。因此，他們甚至對被監禁的共產黨人的家屬都不饒恕。處境最感困難的就是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以及軍人的家屬，因為他們在戰爭結束以後完全靠領工資維持生活。而這些人多半是人民大批參加民族解放軍的地區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家園都被占領者及其走狗燒毀了，財物被搶劫一空；被監禁的共產黨人的大部分家屬都遠離自己的家鄉以及能夠給他們以力所能及的幫助的親人。剝奪這些人的自由也就等於剝奪了成千上萬個家庭的起碼的生活資料。照例，這些家屬都離開了大城市，因為他們在大城市很難找到工作。在大批逮捕時期，許多家庭為了尋找棲身之所而遷移的這種現象，與遭到大火災、大水災或戰爭時期的搬家的情況頗相似。那些有親友的家庭，而其親友又敢收容他們的話，可以搬去；而在有些家庭里，由於父母都被監禁，孩子們就流離失所。這樣的事多得數以千計。讓我們在這裡說一說因企圖越境而被打死的南斯拉夫空軍上校米爾科·舍巴諾維奇的情況。他的妻子從1941年起就是第一無產階級突擊隊的游擊隊員，在戰時失去了一隻手，被逮捕後，送

到了哥里·奧托克集中營，使他們的唯一的九歲女兒無依無靠。兩個老共產黨員、民族解放鬥爭的英雄的這個女兒，就因得不到任何關懷，無法生活，無人監督，而從十三歲起就在道德上墮落了；為了生活，被迫出賣自己童年的肉體；她的母親被釋放出來的時候，忘記了在鐵托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集中營內所受的一切苦難，忘記了親愛的丈夫的犧牲。她之所以活着和情願挨苦受難就是為着自己的女兒，然而她發現她的女兒成了什麼樣子啊！對她來說，這比集中營里的生活更加慘痛。

再看另一件事。老革命家、多年的聯共（布）黨員伊萬·科爾出獄後，不知道自己的家——妻子和兩個孩子——的下落。他妻子是俄羅斯人，因為她在南斯拉夫舉目無親，生活無着，被迫離開自己的孩子，住在各種貧民窟里，為了保住這條命什麼活都干。她整年整年一點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們的命運。當丈夫出獄後，她費了很大勁才認出來。可怕的生活條件在他們兩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他們兩人都完全變了樣子，蒼老了。經過長期尋找，父親終於得知自己的女兒在收容所里。當父親去接她時，女兒認不出父親，根本不承認他是自己的父親。他又費了很大力氣才在格爾策哥文的一個遠親那里找到一個兒子。這種事例在南斯拉夫並不是個別的，這就是鐵托的“人道主義”以及他“對人的關懷”的明證。

國家保安局和 KOC（軍隊偵察機關）的軍官們在逮捕人時的沒有人性的行為，对被監禁者的家屬會造成什麼後果，他們是漠不關心的。再舉一個例子，久科·米腊舍維奇將軍和他的妻子是在學校放假、他們的孩子不在家的时候被逮捕的。當孩子們回家以後，發現房子已經被一個不認識的人占了，家具已被沒收，所有的財產都被搶走了。南斯拉夫流亡者告訴我們，很多人可能提出一個問題：到底為什麼要破壞青年一代的理想？他們本來是應該受到社會主義精神的教育、繼續踏着自己父母——共產黨人和革命家——的道路前進的。這個問題由當時南斯拉夫資產階級唱的這

样一句歌曲回答了：“铁托同志——白色的紫罗兰，一切反动派都爱你呀！”

国家保安局竭力破坏犯人的家庭， 并使他们的家属腐化堕落

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国家保安局巧妙地利用了被逮捕的共产党人的家属求生存的斗争。如果被捕者的妻子是南联盟盟员，那就要求她非同丈夫离婚不可。就这样，在南斯拉夫被破坏的家庭数以千万计。保安人员还企图逼迫很多犯人的妻子当妓女，以便后来向人说：瞧，他们“这些共产党情报局的拥护者”是一些什么人。除此之外，国家保安局的军官要求家属具结，同意要揭露任何想同情他们不幸遭遇的人。当这些手法不能奏效时，保安人员又采取了羈押的办法，进行侦察，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最能恐吓家属，使他们之中总有人同意做特务。如果用这种手段能够打开一个缺口，那他们就用尽心机扩大这个缺口，直到把婚约废除并且把犯人的妻子变为自己的奴仆为止。如果犯人有兄弟姊妹在国家机关或军队里工作，就逼迫他们公开宣布和他脱离关系。国家保安局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为它工作。在一些被拖下水的家庭内，它的成员同意与国家保安局合作，结果儿子向父亲作密探工作，父亲向儿子作密探工作，兄弟夫妻之间互相作密探工作。甚至小孩子也必须提供关于自己最要好朋友的情报。

如果谁胆敢帮助犯人家属，他就有丧失工作、被捕和坐牢的危险。例如，被铁托分子枪杀的人民英雄阿尔索·约万诺维奇的家属，就生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许多在监狱里被枪杀了的共产党人的家属就过着叫化子式的生活。但是，这点不是说铁托和兰科维奇能够把南斯拉夫人民恐吓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根本不

敢再同恐怖活动的牺牲者团结和联系了，因此铁托集团看到人民有不滿情緒，并且害怕他們的憤怒，就被迫做一些让步。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允許被監禁的軍官的家屬給他寄包裹（而按正式的規定，犯人是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收到包裹的），其次允許他們在星期天和星期六下午，在監獄管理处專門安排好的房間里同家人見面。头几次見面对犯人來說真是重大事件。因为第一，很多犯人长年一点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情况；第二，大多数犯人都挨餓得消瘦不堪，一心想收到一点食物。会面的房間布置得很好看，其目的是吸引探亲者的注意，并且表明国家保安局“十分关心犯人”，同时給人造成一种认为監獄中的生活条件不坏的印象。在会见家人时，犯人必須刮臉、理发、弄得干干淨淨、穿上只是专为这个时候穿一下的新制服。看守人領着探訪者在犯人来到以前先在指定的地方坐好。会见時間可以长达 20 分钟，这根据犯人屬於哪一类而定。这种会见是从 1952 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的。一般禁止犯人和亲人拥抱。在談話时审讯人員告訴探訪者說，犯人不願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也就不想出獄了。因此犯人就不敢讲自己的真实情况，很多审讯人員就在中間搗鬼，要求探訪者同犯人断絕关系，再也不理他了。

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成群結队的母亲和妻子，她們穿着黑色的衣服，好像送葬一样。任何气候条件都不能阻碍母亲花費很多錢从远处来看望自己的被監禁的儿子。她們几乎每月都来看望自己的儿子。每个母亲都想尽一切办法准备并且尽量多带食物到集中营去，因为她們每个人都知道她們的被監禁的孩子忍饥挨餓，之所以有罪，只是因为他們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苏联，只是因为他們坚决地維護真理。

老女教师、約卡·維西奇在她儿子被关在毕列奇集中营的整个时期內，她每月都去探監。她給儿子带来了两包食物。审讯人員发现这个勇敢和有教养的女人显然不滿意这个制度，因此不放她的儿子沃依斯拉夫·維西奇出獄；結果这个高尚的青年人在 1956

年死在铁托的集中营里。这位母亲十分悲痛，她由于热爱自己的儿子，想尽了各种办法去寻找儿子的墓地，以便把他的遗体运回家来，但是，她在没有找到墓地以前，就因悲伤过度而发疯了。

所有这一切，都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衣冠禽兽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关于铁托恐怖手段的受害者，兰科維奇在南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却说什么：“……在我国各族人民进行艰难而严酷的斗争的日子里，共产主义者联盟队伍内外有少数人，他们或者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为了自己的野心，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思想混乱和对我们的力量缺乏信心，在1948年参加了斯大林的反对独立和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从而犯下了背叛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最严重的罪行。”^① 这位哥里·奥托克地狱的创始人接着补充说：“那时没有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只是竭力防止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大家知道，有30 000多共产党员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而在1948年以后，却有200 000名左右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超过了当时全部党员的一半。这是不太重要的“少数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成千上万的人遭受监禁，无数的监狱、惨无人道、一连串冗长的拷问和侮辱——这都算不了什么！好像是在卡列梅格坦街上散步，或者像斗拳，结果不过是某个拳术家的脸稍微受伤，如此而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惯于玩弄字眼，他们不但在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写东西的时候，意思与人不同，就是用世界上其他语文写东西，意思也是相反的，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引用了他们多次说的“民主”、“人道主义”和“教育措施”等话，然后我们列举了许多严酷的事实，来揭穿这些话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但是，那些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并且还在受难的人们的创伤、那些失去了自己至亲骨肉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的创伤、那些家破人亡的人们的创伤，是万分痛苦的，它们绝不是任何演说家的胡说八

^① 见《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126页。

道所能治好的。

* * *

在結束这本小书时，我們不想說，所有題目都已經讲到了，或者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事迹已經終止了。我們在这本小书中所說的都是南斯拉夫流亡者告訴我們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 1956 年以前时期內所遭受的苦难。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結束。在我們面前还有无数材料和事实，证明监禁、拷問和枪决还没有停止，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在繼續进行，因此，我們还要重新談到它們。

必須补充說一下，我国报刊不是第一次报道铁托分子的罪行。我們的报纸用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科索夫、馬其頓和門的內哥罗等地的阿尔巴尼亚人所犯下的駭人听闻的罪行。过去南斯拉夫共产党干部的悲剧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悲剧的情况被揭露以后，科索夫人的悲剧現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它們是互相补充、互相衬托的。这帮匪徒，这群杀人犯，他們枪杀和摧殘无数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大量屠杀科索夫人的优秀儿子，并且折磨南斯拉夫人民。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这帮罪犯、匪徒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非常了解，阿尔巴尼亚人民根据自己的亲身遭遇，深知铁托分子都是口是心非、进行恶意煽动和破坏活动的家伙，他們过去和現在都妄图消灭阿尔巴尼亚，并把它变成南斯拉夫的一个省。

铁托及其同謀者的道路，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的道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具有光荣的历史，它能識破各种各样叛徒的面目。这些叛徒背叛了自己的党和阶级，他們反对共产党人，对自己过去的同志进行卑鄙的誹謗，并且把他們出卖給帝国主义的劊子手。虽然如此，这些叛徒与铁托分子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于铁托分子这伙叛徒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国家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国家，掌握了

可怕的警察机构，它被用来疯狂地攻击一切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不愿踏上南斯拉夫统治者早已在走的叛变道路。

在他们的罪恶被揭露以后，他们就大喊大叫妄图证明不可能的事情，即想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人”、“受到了没有根据的责备”。当我们的报刊公布了科索夫 36 000 名阿尔巴尼亚科索夫人爱国者被杀害的事实以后，铁托分子起初声明说，他们都是巴里斯特分子（即“巴里·科姆别达尔”卖国组织的成员），或者说，都是战犯。那末对过去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1 000 多名党员的悲剧，他们又怎样解释呢。

另一方面，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铁托分子支持战犯，并且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他们把战犯当做自己的客人一样殷勤招待，然后就派遣他们到我国领土上来进行破坏和挑衅活动，从这本小书里我们已经看到铁托分子利用切特尼克和乌斯塔什分子的效劳，来折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和国际主义者。难道他们认为这些罪犯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是“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战士”吗？对，这些人类的渣滓是拥护南斯拉夫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而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希特勒分子的继承人冯·布伦坦诺等这帮人也支持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对匪徒和乌斯塔什分子这帮罪犯们来说，这有多么幸福：因为他们在铁托和兰科维奇领导下，竟有了这样的日子，能够成为屠杀和折磨共产党人的凶手，也就是继续干着在德拉日·米哈依洛维奇和安特·巴韦利奇时代早就干过的一切活动。

我们在这本小书的前面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在铁托监狱和集中营里的苦难的时候，曾经提到但丁的《地狱》篇里关于神的滑稽剧。如果伟大的斐阿伦支诗人的作品中写下了从他的幻想而生的悲剧，那末，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见的却是现实的悲剧，是我们时代的最痛心的悲剧，是为社会主义流过血的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悲剧，而他们的鲜血现在却正在遭到并且继续遭到这帮叛徒和卖国贼的粗暴蹂躏和亵渎。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千千万万人的

个人悲剧。

在这本小书里，我們曾提到許多名字，列举了一些被杀害或被折磨死的人的事件，提到了一些家庭悲剧。哪一事件最使人惊心动魄呢？是伊什特万·杜鮑什事件还是瑞基奇事件？他們两人都是被殘暴地折磨死的。是获得过許多勳章的那位备受卑鄙凌辱的老將軍久科·米腊舍維奇的遭遇呢？还是那位不幸的母亲、老女游击队员的命运？这位母亲的丈夫被枪杀了，她本人也被关进了監獄，她一从監獄里出来就发现她的幼女在道德上已經墮落了，为了一块面包而不得不从13岁起就出卖自己那未成年的肉体。哪一个家庭或个人的悲剧更使人惊心动魄呢？是那位母亲——她的曾經在山上同法西斯分子作过斗争的儿子出獄时竟当上了特务——的悲剧呢？还是那位剛从監獄出来就获悉自己的妻子在为国家保安局效劳的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悲剧呢？很难說，在所列举的悲剧中哪一个是最沉痛的。分开来看，每个都是真正的悲剧，而整个來說，这又是南斯拉夫人民大悲剧的一部分。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和犯罪手段，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正是由于他們这种才干，由于他們处心积虑地消灭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它的最忠誠的干部，正是由于他們卖力地到处搞分裂活动（这是帝国主义最为需要的），华盛顿才对他們毫不吝惜美元。

铁托集团不仅毁灭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在自己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不遗余力地进行破坏活动，这就明显地表明它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些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从布达佩斯的反工农政权的暴动起，到在近东反对刚刚从殖民主义政权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独立，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止，——在所有的地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都一贯充当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暗害分子的匪帮。近来，铁托的“理論家”爱德华·卡德尔在《战斗报》上以《社会主义和战争》为题发表了一連串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攻击。这只不过

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旨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最感兴趣的——的又一次袭击而已。

为了便于自己的破坏活动，南斯拉夫特洛伊木马需要把自己肚子里所藏的东西伪装起来，否则它就变为无用之物。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就竭力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装扮成用自己那种特殊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千方百计欺骗世界舆论，蒙蔽南斯拉夫人民的眼睛，使之看不见他们已经犯下和正在犯的，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罪行；掩住南斯拉夫人民的耳朵，使之听不到从监狱和集中营传来的呻吟的回声。

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不论是《战斗报》上的“理论文章”，还是那些冒充能够主宰世界命运的神明的人（而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匪徒和刽子手罢了）的演讲，都掩盖不住这些事实。上面列举的事实再次说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它的“理论家”和“人道主义者”是怎么一回事。

封面
目录
正文